

#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28日

第三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 本期目录

### 史林一叶

周孜仁 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

### 书评与序跋

余汝信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

### 江青研究

阎长贵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 蓦然回首

曾国一 险遭镇压：一个摘帽右派的文化历险

###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一）

### 闲读偶记

鲁丁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记忆》第二期读后

### 故纸堆

人民日报讯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通过实践改革了三个体育项目

### 小资料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编读往来

---

【史林一叶】

## 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

周孜仁

—

重庆大学决定建造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这是 1967 年的 6、7 月间的事。

根据笔者保留的一份书面资料：1969 年 10 月 20 日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关于我校毛主席巨型塑像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情况汇报》），兹将巨像基本数据照录如下：

（一）像高：9.15 米 座高：5.7 米 平台高：1.15 米 总高：16.0 米

（二）广场：（具体数据略）整个广场加周围开阔地可容 20 万人集会

（三）辅助设施：词屏：高 5.16 米，长 26 米，深红色水泥面，刻有毛主席震撼世界的词“满江红”手书，字体用黄金箔贴面。

红太阳：词屏顶上红太阳直径 8.5 米，周围用 40 只金黄色钠灯组成……

其他辅助设施：包括两幅毛主席油画像、八根 8.15 米的旗杆。

在偶像崇拜的年代，重庆大学计划修建的塑像不算第一个，当然也绝非最后一个。早在文革肇始的第一年，1966 年的 6 月 24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小将”便以“破四旧”为由将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物二校门作为“封、资、修”砸掉，并于废墟上建造了毛泽东塑像一座。从此后，随着造神运动愈演愈烈，水泥的、金属的、石头的、尺寸规格大小不一的毛塑像便雨后蘑菇一般，开始在全中国各地疯长。

毛泽东塑像，从本质上说当然不是艺术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建筑。宗教建筑总是需要让人感觉神秘而崇高，它的造型、结构和尺寸，总是充满隐喻和象征。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统计，全国各地毛塑像的普遍规格为：像高为 7.1 米，象征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日；底座高度为 5.16 米，纪念 1966 年 5 月 16 日，即毛

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总高度 12.26 米,象征毛泽东的诞降吉日:12 月 26 日。

将这些常用数据和重庆大学对比,我们发现有些是相同的,如词屏高度 5.16 米;有的是容易猜出含义的:如座高 5.7 米,肯定代表毛泽东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给林彪那封信,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还要工人学这学那、农民学这学那、学生学这那,云云,即所谓“五七指示”。但人们很快会从比较中发现几个与众不同的数据,如像高,为什么偏偏是 9.15 米?八根旗杆为什么偏偏要 8.15 米?其中究竟暗藏何种玄机?

先破解旗杆高度:8.15。重庆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叫“八一五战斗团”,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该校主流派别,人多势众。另一派叫“砸派”或“反到底”的,起事稍后,人数当然少些,尤其在重大校园,人少得长期不敢回校,怕挨打。8.15 米,显然是掌权者想用物化的尺寸向众人宣示:该战斗团全体将士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永不变心。

再说 9.15。这个数字含义只有八一五自己心知肚明了。8 月 15 日造反起事,学生们便“炮轰黑市委”,发誓要打倒这个、砸烂那个的,当权派能高兴吗?不高兴。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大学生自以为深得毛氏真传,想当一回革命的“铁扫帚”,把重庆市的大小“走资派”们通通扫进“历史垃圾堆”,不料对方还大权在握,同样按照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教导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把他们通通打成了“反革命”和“暴徒”,还仿照造反派模式,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被百姓戏称为“保皇派”的,排山倒海,对八一五鸣鼓而攻之。这是大学生们初进政治幼儿园遭遇的第一场生死 PK。仓惶无计,就在火炉山城的毒日头下静坐绝食,绝食无果,就徒步北上告状,最后爬火车去了京城。北国 9 月秋凉,朔风初起,重庆大学的娃娃还穿着炎炎烈日下绝食的背心,一个个蓬头垢面,整个儿一群流寇。适逢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百万“文革大军”,流寇们于是有幸靓见了自己心中的神。这该多大幸福呀!这日子肯定是终身不可忘记的——那一天正是 9 月 15 日。

朝觐当日,笔者作为八一五一员有幸躬逢盛事。几十年后回首重述,必须非常负责地做如下说明:大家所说的幸福经历,其实是很惨的。说是见了伟大领

袖，其实只看到了一个几厘米高的黑影，有不少人甚至连这几厘米都没看见，只是到天安门广场去白白挤了一回热闹。为什么？来自重庆的“流寇”们太守规矩。接见头天便接到通知，说次日下午接见，要他们中午 12 点准时出发前往就位，还通知说重庆路远，来此不易，故特意安排他们在广场西观礼台最佳瞻仰位置。谁知北京和外地的“油子”们早在头天夜里就彻底占领了整个广场。等我们按时赶到，只被堵在西单路口动弹不得，左右、前面都有密匝匝大兵围堵。几千人只能傻站那儿声嘶力竭高唱颂歌，从“抬头望见北斗星”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从“雪皑皑”唱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唱得唇焦舌燥，天色向晚。五点钟，终于大会开始。好容易进入游行程序，广场上的人可以慢慢挪开了吧？我们可以进场瞻仰真神风采了吧？不！占领广场的人坚决不走。谁不是千辛万苦才到圣地？凭什么不该抓紧机会多瞧几眼？不管周恩来在喇叭里如何苦口婆心劝说大家往前挪动，广场上的哥儿们、姐儿们就是死活赖着不走——一直到天已黑尽，喇叭里宣布散会了，赖皮们无奈离开，我们才得以入场：这时，天安门早已黑灯瞎火。

笔者有幸，正欲黯然离场，城楼上陡然大放光明！原来，毛、林之属这才开始正式下楼——我必须发誓：这一次，我确实看见伟人了。黑影儿。根据工科学生的工艺直觉，尺寸约四至五厘米：他正很认真地挥甩帽子——接着便消失了。笔者悲喜交加，当即泪如雨下。事实上，当天不仅我哭，很多同学都哭。千难万险，万里北上，真想不到竟是如此悲惨下场！我好歹算是看了个黑影，很多同学，连这幸运也没有呢！

事虽如此，哥儿们还得“打肿脸孔充胖子”——政治斗争是会逼迫你学会做戏的。回渝那天已是深夜，万里来归，年轻的漂泊者们全顾不了旅途劳顿，在大街小巷一路游行，高呼“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刚刚安睡的夜山城从梦中骇然惊醒：这世界怎么啦？如此众多“暴徒”、“反革命”公然受伟大领袖接见了啦？这世界莫非真要天翻地覆？一贯被百姓奉若神灵的共产党市委，这回莫非真要栽了？

1966 年的中国，真地就稀里糊涂天地翻覆了一回。重庆大学的娃娃们见到神没见到神一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回，毛泽东确是他们真正的精神领袖。有他撑腰，重庆市执掌权柄的政治白痴们焉能招架？交手数月，果见分晓。当“黑

市委”和“保皇党”最终被赶下历史舞台，就轮着造反派内部两派来捉对儿厮杀了——这就有了“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不管怎么个你死我活，反正都是毛泽东的宠儿，都需要狂玩政治秀，表征自己是正宗革命路线代言人。

这就有了建造巨像之举。

1967年7月8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机关报《八一五战报》30期在头版位置，正式宣布了这则消息。原文摘要如下：

七月一日，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四十六周年的诞辰，我们八·一五战斗团的战士满怀革命的激情，热烈庆祝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节日。下午三时，我校数千名革命师生员工头顶烈日，在风雨操场举行盛大集会，……大会主席说：“为了纪念‘七一’这个伟大的节日，为了表达八·一五战士对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决定在我校八·一五广场塑造巨型毛主席塑像，并在今天破土奠基。”

第31期《八一五战报》继续报道事态进展。还是头版头条：《让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普照重大校园/毛主席巨型塑像在重大动工塑造/全校八·一五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表示：一定要沿着最高统帅所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宣布：

经过几天来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和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现已完成初步方案。……全校八·一五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都积极投入了这一项光荣的施工任务……他们表示：一定要把重大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沿着最高统帅所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目前，塑像工程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预计在一月以后，塑像就将落成。

事实上，这座“预计在一月以后”落成的塑像，从1967年7月1日开工，到12月27日落成，用了整整半年时间。

笔者建筑知识孤陋寡闻，有关工程进度只有一个非常可怜的概念，就是80年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深圳速度”：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楼高52层，建设速度三天一层。我私下计算，层高以三米计，每天进度当有九米。文革那会儿天下大乱，速度再慢，毛塑像加台高不过区区16米高，建设何以需用半年？关于这个，除了上面提到的《八一五战报》相关消息，我们还当一提文章开头说到的《情况汇报》，在关于“敬建毛主席像是我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段，有若干词句可供解读：

座谈中许多革命师生说：“毛主席塑像的落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充分表现了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也是对刘少奇反对毛主席，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

原来，这确非一项建筑工程，而是打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者刘少奇一伙的生死斗争，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政治操作。接下来还有：

一些亲身参加塑像工作的同志也有同感，认为塑像的建成是毛主席教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胜利。大家说：尽管阶级敌人挑动武斗，战火纷飞。天气又热，但塑像工作一直未停工。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操作政治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代价，所以在这儿少不了“苦”呀“死”的。笔者没具体参与塑像建设，但那段时间正好一直在校，亲身所感，窃以为上面所说谁谁谁“挑动武斗”、什么“战火纷飞”、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绝非夸大其词。

重庆大学塑像筹建委员会（简称塑办）1967年7月1日宣布挂牌运作，此前不足一月的6月5日，重庆两派刚刚发生了规模可观的“六五血案”。先是，

地处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反到底派八三一纵队实施突袭，进攻该院八一五派“春雷”总部所在地新图书馆大楼。八一五从城里急调数千人马星夜驰援，实施反包围，解救了同派人员并俘敌 200 余人。反到底旋即调来大队人马增援，在北碚至市区间间的施家梁峡谷阻击重大八一五班师回校的人马，还生擒重大八一五二号人物、驰援行动总指挥熊代富……

从此以后，武斗愈演愈烈。除了飞机，所有常规武器：从军舰到坦克，从榴弹炮、三七高炮、四联机关枪、马克辛机枪到半自动步枪，从土装甲到土手榴弹悉数登场。资料记载，1967 年 7 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而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

1967 年 8 月 13 日，八一五的一周年“生日”要到了，为表示“庆贺”，反到底派于 14 日晚 11 点半从江北向八一五派占据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展开猛烈炮击，并于次日晨攻占了南桥头。与此同时，反到底派也从江北向重大校园发射了炮弹。

重大图书馆一位职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所控的江陵厂——笔者注）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里，人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 10 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 6 时才停。”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斗了。有人干脆把它称为“八月国内革命战争”。不管革命与否，反正说它战争已不算言过其实。那么，毛泽东塑像的命运如何呢？1967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八一五战报》第 36 期有如下说法：“为了让毛主席的巨型塑像早日落成，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重大，全校八·一五战士和革命师生以冲天的干劲投入塑像工程。在八·一五革命派的大力协助下，工程进展

良好，施工速度很快。在短短的三十来天中，先后完成了毛主席巨型塑像设计、筹建和泥塑小样工作……（他们）戒骄戒躁，乘胜挺进，又完成高八.一八米（应为 9.15 米——笔者注）实体像泥塑，即将投入铸模工作。”

炮战开始时，毛巨像的等高泥塑确已骇然耸立在三教学楼前的地坝上：虽然工程已暂时叫停，但它在惨烈炮战中却毫发无损。为何？八一五自己有一种说法是：反到底敢往三教学楼方向打炮吗？只要他们的炮弹把毛主席身上擦掉一块皮，保险：轰动全国的反革命大案！——其实，反到底派并不知道这边有座领袖巨像。当年到处有领袖照片、画像，几乎人人身上有领袖像章、语录本，如果炮手枪手们都有如此顾忌，那么武斗也打不起来了。何况重大这座领袖巨像还只是个雏形。

事实上，离塑像直线距离不足 200 米的电机系主任江择佳的厨房，就被一枚飞天铁丸击中，在墙上戳出一个直径 37 毫米的窟窿。老教授感慨系之，合伟大领袖名诗“当年鏖战急”原韵，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窟窿边上，题曰：“八一八炮轰纪念”。诗云：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我和敌

教授赋诗后第三天，8 月 21 日凌晨，重庆四十一中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江丕佳，江教授的爱子，在市内枇杷山顶上被流弹击中身亡。

重庆大学所在的沙坪坝已成一座孤城。占领嘉陵江北岸的反到底，用机关枪和大炮封锁了化龙桥。东南通道出口的大坪、杨家坪，此时大战犹酣。沙区和城里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连老百姓生活用品运输都成了问题，还侈谈什么建筑器材和水泥？一切都已停摆。八一五的哥儿们对毛泽东再有耿耿忠心，毛泽东巨像的修建，想快，能快得起来吗？



### 三

类似重庆大学建造的这种巨型广场塑像，一般程序该是这样的：

首先做一个 30 至 50 厘米的小稿，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重大的小稿是做了多个的，放在饶家院一间专门的展室里，向广大“革命群众”征求意见，同时作为礼品，分赠省、市革筹组领导，及兄弟单位。

第一阶段完了，再做一个 1 米左右的定稿。

最后，为确保最终成品的实际视觉效果不出差错，还得根据定稿做一个 3 米左右的放大稿。施工人员和工匠便以此为依据，制作水泥的、或金属的、或石头的成品。

重庆大学塑像不拘一格，从小稿一口气便直接进入实稿。政治局势翻云覆雨，瞬息万变，重大八一五没那么多时间折腾。还有，该巨像主塑叶毓山乃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早年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塑造毛泽东雕像便声名鹊起。让他掌舵操盘，光辉形象焉能有何差池？

叶毓山，四川德阳人，1956 年从川美毕业并留校任教。60 年代，四川美院的强项正是雕塑。文革之初，泱泱中华，所有文艺作品纷纷落马，唯川美的泥塑《收租院》得以幸存，还被奉为“社会主义文艺明珠”。叶毓山，正是雕塑系台柱。80 年代他创作的大型群雕《歌乐山烈士纪念碑》获全国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继而升任该院院长，成了中国雕塑界大师一级的人物。

文革开始那会儿，毓山先生还是一介老师。他行事低调，落落寡言，属埋头苦干的工作狂一类角色——这正好和他夫人：美院老教授江孜之女、行事痛快的版画教师江碧波彼此互补。

重大者，重庆高校之“大哥大”也。文革了，重大八一五又成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哥大”，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大哥大”盛情相邀，且任务如此光荣，叶先生焉能相拒？这就无条件来了，当然也是无偿承担义务。十多年后，参与塑像工程一位主要当事人给“专案组”写的一份名为“情况说明”实为“交代材料”的，密密匝匝 18 页，洋洋洒洒数千言（为何称“交代”，下面还有说明），“交代材料”对此过程有如下叙述：“据我们了解，美院叶毓山同志政治可靠，历史清楚，思想进步，适宜担任这项工作”“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决定在校园塑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群众热情高，条件很好。但是由

于我在雕塑方面缺乏经验，要求有一两个专业人员帮助”，“经‘塑办’的同志研究，决定请他（叶毓山）来校担任帮助工作。1967年7月5号（或6号）叶应邀来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当天，他即准备回去，但我们一再挽留他多帮助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受到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的鼓舞，于是就在学校住定下来，开始塑像工作。”

下面还是《交代材料》。在无可奈何的字里行间，我们多少可以触摸到重庆大学造反学生当时对叶老师的殷殷礼遇之情，也可以感悟到中国艺术家有多么敬业：

叶毓山同志和他爱人来我校后，四川美术学院就停发了他们的工资，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和XXX等许多同志研究后，由学校暂借……550元……美院补发工资后，他已主动归还了大部分……后来我根据他的情况向革委会写了报告，给他申请了伍十元补助。

还有：

叶毓山同志和家属在我校的膳食费是由他们自己解决的，在松林坡二食堂搭伙……记得当时全校搭伙人员，食堂都发有荤食票，他们没有。大家吃肉，他们只能吃素菜。后来我们感到过意不去，才同当时群众组织的后勤部门联系，向他申请了其他职工同等定量的荤食票给他们。

叶毓山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作风正派，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表现是好的。

塑造毛泽东，一般须在五个选项中首先确认：1、站像还是坐像？2、穿军装还是穿便装？3、穿军大衣还是穿夏装？4、挥手还是不挥手？5、戴军帽还是不戴帽？根据广大革命群众意见，1、2、3、4选项均为“YES”，仅第5选项为

“NO”。这就出现了若干具体问题：帽子罩在头上，确实不利于表现伟人高瞻远瞩和天庭饱满的睿智，可是，帽子不戴又放哪儿呢？那就拿在手上吧。叶教授觉得拿在手上从视觉上很难处理，这就想了：毛泽东不是喜欢背着手吗？众人不是要让他穿军大衣吗？对了，就把帽子藏军衣后面的皱折里得了。叶教授没有塑过毛的军装像，八一五总团领导知道了，马上派人去警备区，直接找到军长韦统泰。军长身材魁伟，威风凛凛，把他的军衣军帽用来当道具正合适，这就在军长家连衣带帽一起抱回来交给了叶教授折腾。

美术学院为何要扣发叶兄工资？这自然也和政治有关。当时全国百姓都分为两派，川美也不例外。在川美掌权的是反到底派红色尖兵团。作为艺术家的老师也不例外。由于种种原因，或本人属“反动学术权威”者流，或家庭出身、政治历史等等殊多灰疤黑迹的——这些老师也许不敢像青年教师那样挺身而出，公然参加组织活动，观点却总是有的。叶老师属于是什么观点：“八一五”还是“反到底”？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是：他公然到八一五的老巢来帮忙干活——此事本身就足以引起美院反到底派红色尖兵团本能的敏感和愤怒：这不是反了么？尖兵团战士很快向叶教授致函一封，同时在街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勒令叶必须立即返校。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些文本的原稿了，按照当时流行提法，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函件、标语和大字报，总是少不了“竖起狗耳朵听着”“否则格打勿论、格砸勿论”之类最后通牒似的可怕威胁

再说，叶先生的夫人和两个小孩还家住美院，轻而易举便可成为反到底人质。重大八一五一不做二不休，来个先下手为强，干脆派人把教授夫人和孩子一起接来八一五根据地：沙坪坝。叶先生小儿当时不满两月，重大就连保姆一起接来，安顿在电机系教授陈文纯家楼上暂住。叶、江两大师在重大所受到的礼遇，由此可见一斑。换句话说，不仅艺术家本人，夫人也该被重庆大学的诚意所感动的，也没日没夜地参加了塑像配套工程“东方红广场”的艺术设计。几十年后，退休赋闲的江碧波被礼聘为重庆大学新建的人文学院院长，算是题中之义了。

在叶先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9.15米的实稿很快做出来了，而接下来的工作，却难以为继。战火日盛，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都已停摆。

在重庆8月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重大校园依旧很热闹。本地的工人阶级是无班可上了，没地方好去，就来重大看热闹。其他“沦陷区”被赶出来的，如江北

区的八一五派，无处可逃，也跑重来了。反正重大财大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难民”们住学校里无事好干，每天就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行者游于途，倦者休于树，真的个热闹非凡。校园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但最具人气处是两个：一是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那儿是停放死者的好地方。山城8月，毒日似火，尸体最容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蚊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是好过些。难民们都喜欢去那儿为“保卫毛主席”而殒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狰狞可憎的“砸匪”俘虏到底生得什么样子？在战场上被生俘的“反到底”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着，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尸裹尸。难民们少不了向他们扔几块石头碎瓦发泄仇恨。

另一个热点景区，自然就是毛泽东巨大的泥身塑像。地点是三教学楼前的空闲地坝。塑像够大的：九点一五米，可谓巍巍乎高哉。担心烈日暴晒，泥巴会开裂塌落，八一五们用油毛毡为它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凉棚遮阳，每天还有人提着水桶，沿脚手架上下攀爬，给泥像浇水保养。因为有人围观，八一五战士便荷枪实弹，非常威风地为泥塑站岗，当然也热心热肠地向观众介绍他们塑造偶像如何之呕心沥血，胆气冲天。介绍得很自豪。

躺在前一景点停尸房里的人，是为后一个景点里那个泥捏的人去死的。那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呀！战火纷飞，交通断绝，刚刚消失的年轻生命却是必须马上处理的。八一五们实在没功夫造像了，得先造坟墓，让血肉模糊的尸体尽快入土为安，于是在教授区幽风满山的松林坡顶为他们挖了一个墓坑。没有石料，就把校园内民主湖畔的石栏杆拆了，为他们筑一圈围栏，立一方石碑。石碑上刻了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

巨像没有落成，为保卫他而无辜死去的年轻人墓穴先落成了。葬在里面的人数是24。

#### 四

几十年后，如果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那么这些制造、或者准备制造塑像的人，不管嘴里多么信誓旦旦，心中对偶像其实并不忠诚。

几乎就在重庆大学建造塑像的同一时间：1967年6月28日，首倡造神运动的推手林彪就发出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

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据此发出通知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接下来，林彪将通知稿转呈毛泽东审阅。

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林彪造神屡屡得手，到文化大革命，可说已运用自如，臻于化境。但这次的马屁毛泽东却并没赏脸。1967年7月5日，领袖对上述报告批了：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7月13日，周恩来将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指示和上述批语一道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或曰：重大的学生娃娃对中央通知尚不得而知，那么，肯定知道了上述《通知》还要对着干以表明耿耿心迹的，则远非重庆大学、甚至远非不知天高地厚的高校学生。即使深谙庙堂游戏规则的高官，也和上述批示对着干。对于政治赌徒来说，按上司脸色行事，只属于初级段位。高段位者，则不仅能看出上司脸色的真伪和真伪程度，更重要的，是要看透脸色背后的玄机：脸意真诚？故作姿态？还是正话反说，欲擒故纵？然后不失时机、甚至提前下注。这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了的政治智慧啊！韩非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过：“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人主总喜欢表面上做一件事，暗中却想干别的事。

多年以来，毛泽东就个人崇拜发表过许多著名言论，确信“个人崇拜”具有永恒的政治价值。他曾对美国记者这样说：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956年，苏联刚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毛在两年后的成都

会议上就针锋相对，说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1965年，正是毛准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前夕，是年1月9日，毛泽东又曾告诉斯诺，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正因为如此，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鼓动群众去摧毁他认定要反对他，并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因为这个，毛孤注一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灾难性的“大革命”。

文革闹得沸沸扬扬的1967年，毛泽东偏偏来一个替个人崇拜降温的“七五”批示，当时，谁能猜得透真伪？

就在战火纷飞，交通断绝、工程难以为继的时候，重庆大学八一五总团突然接到重庆警备区通知，要他们马上把叶毓山送去北京，并确保安全——原来，总政治部且不管什么伟大领袖明里批了什么，他们决心已定，偏偏要在毛鼻子底下建造他的巨型塑像，并且确认由叶毓山主塑。

重大八一五不敢有误，马上把人送去了警备区，为确保安全，还专们让一位老师全程陪护——这位老师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写《交代材料》的主要当事人王克让。

王克让，电机系60届学生。曾任重庆大学美术社社长，毕业后留校党委宣传部改行做政治宣传。从名字就知道他必定出身文儒世家，家学渊源，成分也不会“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出身不好而能入党并留党委工作，肯定是处世小心、行事低调而认真。他兼懂工业和艺术。塑造巨像由他打配合位显然是最佳人选。几十年后，我在他家里看到一本保存完好的资料，他这样记录自己的心情：“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曾经经过一段特殊的、神奇的、甚至疯狂的时期。/人们崇拜一位伟人、敬仰一位领袖，如痴如醉。/塑光辉形象，造不朽神灵，如浪如潮。/我亦学步雕塑，归向了艺术之技术。/也许，这就构成了人生。”为了塑造偶像，他称自己“可以说废寝忘食，一腔激情。自己塑造、自己翻制，自己满足。”

叶、王二人在警备区小住一宿，次日即被送进火车站乘车去成都。几十年后，王老师这样介绍那一难忘历程：“专门为我们找来一辆军列。全挂的平板车，平板车上面还装有机枪等各种轻重火器，还架有高炮，只有两节卧铺供起居生活。

上车前，部队领导一再叮嘱：成渝线一路武斗正酣，不安全，要我们千万不得下车活动。安全抵达成都军区，两天后军区即派人把我们直接送机场，飞了北京。”

叶、王二老师被安排在总参谋部招待所，这时他们已经清楚此行的目的了。按惯例，先讨论“站像还是坐像”、“穿军装还是穿便装”、“穿军大衣还是穿夏装”、“挥手还是不挥手”、“戴帽还是不戴帽”等等，然后就让他们一直呆着，直到9月30日夜，房间电话响个不停，反复问他们休息好不好？睡没睡？直到半夜两点，他们说已经上床安卧，方才告诉说第二天8点正，有人准时来接。第二天是国庆日，来一军人，专车把他们送到天安门观礼台，让叶、王二人享受了一回英雄、劳模待遇，远距离观察了伟人的风采。

接下来，叶毓山留北京做稿子，王克让返回重庆，事情再无下文。

## 五

这场被人戏称为“八月国内革命战争”的武斗，打了整整两个多月，终于戛然而止。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运动的号召》。这个“中发67（274）”号文件明确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垮台了”。文件要人民务必搞明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伟大的长城”，接着宣布：“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接着警告：“要防止破坏，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总而言之，事关大局，造反派是不能再胡闹下去了。再四天，即9月5日，上述四单位再次发文。这个中发67（288）号文件干脆就叫做命令了（俗称“九五命令”）。题目是“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除了重申“八二五号召”中的几个“不准”之外，更加肯定地宣布：解放军（对反军抢枪者）“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如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少数坏头头和少数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进行自卫还击。”

战争终于结束了。为伟大领袖塑像的政治秀又可以继续秀下去了。现在留下的只是一些工艺问题，比如，前面说过的，毛塑像挥动巨手指引航向——这手一

举就很麻烦：用《材料力学》的专业术语说，这是一道“悬臂梁”，上吨重的水泥悬臂如何支撑？钢筋如何配置？等等——对于高手如云的全国重点工科大学：重庆大学来说，处理这些麻烦正是强项。

事情开始不久，我去“塑办”看望王克让老师，那天他坐在大大小小的毛塑像间对我侃侃而谈，显得十分有成就感。从他那儿，我才知道了雕塑有“废模”、“块模”之类诸多工艺概念。王告诉我，无论“块模”、“废模”，都得先用泥巴做一个原型，然后制作模具进行再加工。“块模”是指可多次使用的组合模具，拼在一起便能翻出石膏或其他造型材料的成品。制作“块模”是不需要毁掉泥塑原作的；模具制作水准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模块数量是否最少？模块的“拔模斜度”是否合理以便于取模——我校批量制作的礼品石膏毛塑，就是采用块模制作的。废模则是一次性使用的整体模具。废模制作时需“废”掉泥塑原型，同样，成品浇好后模具也得“废”掉。毛泽东巨像体积大，几何形状复杂，肯定得采用“废模”了。其工艺难度，又在于配筋及钢筋的预加应力和热处理等，还有就是离心浇铸，千万防止水泥浇不满、发生气泡等诸问题……

这些工艺流程在王老师的叙述里行云流水，简直就像专家谈经——事实上，后来他果然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这是后话。

几十年后，我在王老师家里看到他当年整理的一份工作笔记，兹小摘两段：

翻模之前，要考虑到今后浇像时模具的定位问题，特别是最下一段模子翻成后，怎样才能安放在基础上的对应位置。每段模子都要明显的定位标记。有的单位由于定位标记没有作好，吊装模具时对不准中心。花了很多时间，影响工程，浇成后效果也不好。

模具在水平方向要留气孔，避免浇铸时气泡不能排出。如图左：肩；右：鞋。

(图略)

取模时注意三点：1，要尽力保护模口，严禁在模口上蹲踏、敲打，因为这一部分如有损坏，难得修补，必然加大今后的工作量；2、起吊时，要使模具受力均匀。先用人工使模具分离后，再行起吊……



这完全和制作其他工业产品的工艺说明书没什么两样，兹不再录。和上述这些资料被王老师同时保存的，是那份长达 18 页的《交代材料》，还有，就是他收集的、全国各地毛塑像的照片和数据。他在自己制作的册页里这样说：“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苏联穆希娜、马尼泽尔的雕塑，崇拜致极。对于雕塑的塑造和翻制，更感神秘。经历六七年重大塑像的工程实践，我对雕塑已是入迷。”

册页装订工整，几十年后依然完好如初，俨然一份极为珍贵的家藏。听王老师回忆往事慢吞吞的语速，和脸上含义不清的微笑，我忽感到心中有一种酸楚。我知道，正是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他自己对这一改变，至今难加评价。

更多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同学、老师，却更愿意告诉我曾有多少人、曾怎样为塑造偶像挥霍过自己的激情。

吴盛军，重庆大学工人班同学，回原来供职的重庆建筑机械制造厂一吆喝，对方马上齐刷刷开来三十多辆卡车，为工地拉沙、拉石头，完全免费。唯一的要求只是：当时武斗尚未完全平息，他们要重大为每辆车配备一名武装人员；

赵云生，动力系老师、“敬塑”办公室主任，如今饱经沧桑，垂垂老矣，细说当初来校义务劳动者，至今情热难抑，如数家珍：参加过长征的解放军“红军团”、刚从越南战场撤回的空军战士、工人、近郊农民、中学生、甚至沙坪坝街道的小脚老太太……山城暑热未褪，他们顶着毒日头，甚至在大雨倾盆中甘忍劳累——每天前来表忠心、要求义务劳动的人满为患，让赵老师伤透了脑筋！

还有一位老师，专门让人来电转告我，说一定得把袁成善的名字写上：这位重庆灯泡厂的工程师和他哥儿们为“东方红广场”免费研制大功率的“小太阳”：高压钠灯，曾如何地熬更守夜……

还是通过《交代材料》中无可奈何的叙述更准确地来猜度当年的故事吧：

问（专案组提问，下同）：美术公司的两个人是怎样来我校的？（谁介绍来的）他们的工资又是怎样解决的？

答（王克让回答，下同）：……当时翻大像模和加工石膏的师傅不够……我

们直接向美术公司请的，他们的工资是按美术公司的规定，直接向美术公司交付的，我曾看过美术公司的收据。

问：十八冶、建工局及其他单位来校劳动，有否解决工资及膳费的问题？

答：十八冶来校支援的问题，请向xxx、xxx二同志了解……许多单位来劳动，是向毛主席献忠心，没有要过重大的工资，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是高的，有的单位来参加劳动，他们喝的水都是自己带来的。

问：所有外来人员参加劳动的夜班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答：……是群众组织后勤部门发的票。凭票在采矿系宿舍那个食堂吃，每人小面两碗；如果加通夜的班，就是吃两顿。

古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可以移山倒海，一是爱情，还有一个就是宗教。当老百姓有了这样的宗教狂热，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造像于是成功了。

1968年1月1日出版的《八一五战报》“特刊”报道：1967年12月27日，“挥动巨臂指引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澎湃前进的毛主席巨型塑像”正式落成。报纸套红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等多个系统“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在东方红广场工地参加劳动”的照片，此外，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驻渝部队全体首长视察现场，以及和重大革委会全体委员在毛塑像下的合影。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红广场”和广场上的塑像成了向偶像顶礼膜拜的最佳去处，全市百姓携家带口，约朋邀友，纷纷来此瞻仰、赞叹、留影。吴盛军，就是前面提到的、来自重庆建筑机械制造厂的工人班学生，他和妻子的新婚照，干脆弄到了毛泽东塑像前面拍摄……

事情再过两年，红卫兵们已经悟透了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一场过眼的闹剧，而重庆大学的全体毕业生，将全体发配去凉山彝区修铁路，即使这样，许多人离校前夕，还是去偶像面前留了一个影——不管怎么样，反正它是一段历史，

是自己生命中一段无法忘却的、刻骨铭心的痛史。

## 六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乱嚷嚷的文革取得“伟大胜利”。现在需要重建秩序了。毛泽东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曾这样透露自己的心曲：“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应当降温了。”“九大”两月后的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中发（69）33号文件，正式通知：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那时我已在云南边疆某行政机关供职，业务所需，我也参与了这次基本上属于象征意义的“降温”工作。边疆落后，和四川这样的美术大省相比，水平低下，可说殊若天壤。然则“无知者无畏”，那些年，要表现“三忠于”“四无限”一片赤诚，边疆人更是放开胆子大干。伟大领袖在他们的描绘、塑造之下，面目全非者有之、奇形怪状者有之，甚至其形狰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者有之。塑像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干脆塑成菩萨，盖成土地庙；还有的，鼻子塑得太大，燕子在里面筑巢，黑乎乎一团，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毛对斯诺说：“看我站在那里受到风吹雨打。实在可怜！”，斯言诚可信也。这些良莠不齐的偶像再不整顿，实在叫人忍无可忍。

本文开始说起的那一份《情况汇报》，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写成的，时间是1969年10月12日。《情况汇报》开宗明义表示：“为了贯彻落实中发69（33）号文件精神，现将我校塑像情况及群众对塑像的反映汇报如下，请上级审查、指示。”整个《汇报》报告分“概况”、“塑像质量”、“关于报告的手续”和“群众对塑像的反映”四个专题，八个页码，600余字，写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从叙述口吻看，当是革委会责成塑像当事人、也是代人受过的王克让老师所写。

却说事过几年，某日，王老师突然来了云南，还找到了我。老友相见，高兴自不必说了。彻夜长谈，叙不完的别情旧绪，最后我蓦然想起：他不是在校党委搞宣传吗？有什么差事会来边疆公干？

他反问我：“你不知道啊，现在我成外科专家啦？”

我更加纳闷。

他有些神秘地提示：“毛主席的手。”

我猜到了：他是说毛塑像。当初，造像热全国一哄而起，到处都是毛主席挥手指航程。这手一抬——前面说了，按《材料力学》理论——就成了“悬臂梁”。如果水泥浇铸过程钢筋配置不当、预加应力不合理，等等，都会留下后患。毛泽东站台上高挥巨臂，开始还行，要不了多久，巨臂就会不知不觉往下坠，再不处理，说不准那天臂折手断，由此而来的政治责任就谁也担戴不起了。那么，把“问题手臂”砸开重来？也不行啊！光天化日之下对领袖动粗，那年月谁有那胆？踟蹰无计，有人就想起了重庆大学那位既精于艺术更精于工业技术的专家。

我已经想不起王老师所言绝招了。反正工业技术的十八般武艺：热处理、化学处理、机械处理……都被他派上了用场，既保持外表不变，又解决病手问题、当然也解决其他“疑难杂症”：包括鸟在毛泽东耳鼻处筑窝、肩膀上拉粪等……诸多毛塑像的后期技术服务，最终成就了王在新兴边缘学科：“艺术科学”——艺术品修复、年代鉴定、石刻防风化……等诸多方面——取得累累成果。再后来，叶毓山先生升任美院院长，友情相邀，王老师干脆离开了重庆大学这一是非之地，在艺术殿堂正经八百做起来“艺术科学”教授——这是后话。

事情又过了几年，文革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已不仅是“降温”了。原校党委那一两个曾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重掌权柄，他们当然不愿意动乱年代让他们夜夜惊梦的记忆继续刺激本就脆弱的神经。他们需要消除痕迹。于是先对松林坡上那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动手：为保卫毛泽东而死的死者坟墓。24位年轻大学生死的时候都非常壮烈。如果把他们的死发生的时间坐标往前挪动二十来年，他们的每一位都将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英雄；如果将他们生的时间坐标往后挪动二十来年，中国定然将会多二十几位工程专家、厂长甚至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可惜他们死得太不是时候。

《烈士陵园》建成先于毛塑像，毁掉他们也就先于塑像——此事比较简单。死者的同学们全都天南地北，桃飞李散，为各自的命运奔忙，谁还能顾得上他们？雇几个民工把墓碑砸了就是，把围栏扒了就是，然后把尸体挖了，土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接下来，厄运轮到了“东方红广场”，轮到了广场上一本正经、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毛泽东——只是这个要麻烦些，先得造点舆论，先得彻查修建过程中的

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如此传统打法谁都懂，不过声东击西罢了。王克让先生首当其冲，难辞其咎。专案组交给他一个调查提纲，共 21 个问题，可说把所有角落都搜了个遍。比如第二个问题：“塑办……哪些人担任采购员？会计？保管？施工等？”、第五个问题：“塑像的石膏、水泥（包括白水泥）的来历如何？是从哪些地方采购来的，是谁采购来的？”、第六个问题：“大理石的购买情况？购买沈阳大理石和上海大理石的情况如何？为什么沈阳大理石购货后有退货？其中付了多少手续费？又是谁在上海买回来大理石？”、第九个问题：“购买黄金几两？是谁去加工的？加工若干张金箔回来？是否全部用完？还剩多少张金箔？由谁保管？现在交在哪个单位？”、第十一个问题：“美院叶余善（原文如此。专案组的人压根儿不知道有个艺术家叫‘叶毓山’——笔者注）是怎样来重大的？他的工资是如何解决的？他在我校期间膳费是怎样解决的？后他的爱人、小孩、保姆全家在我校住了多久？膳费怎样解决？为什么把他们全家接来我校？后又是哪些人把叶的爱人及全家送回他老家？火车费共是多少？是我校付的，这笔钱是怎样报销的？是谁主办的？”……

已经不是调查，而是对疑犯的追供。从所提问题和提问口气，谁都明白他们想干什么。王老师密密麻麻，作了整整 18 页的应答，还无可奈何又不冷不热地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作为开头：“老实人。敢于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的书面材料确是负责任的，造像那会儿，大伙儿命都豁出来了，谁还有功夫去贪小便宜？请大师来做一个巨型雕塑，仅仅给了 50 元补助，吃饭还是他自己掏钱，肉还是众人匀出来的。想在经济上找问题，不是白搭吗？

其实，既然已经大权在握，干什么还需要理由吗？终于，塑像被毁了。据说是 1982 年或者 1983 年一个夜里。花钱让修建防空工事的专业人士实施，用炸药炸的。有点像夜半行窃，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凌晨 3 点动手，平明拂晓，东方红广场上便只余下一片废墟。偶像轰轰烈烈而来，现在悄没声儿消失了……

几十年后，我已无法找到当事人和现场的见证人，也无法对当时的情景加以描述。想了很久，忽然想到借用一个云南案例来叙述当夜情况，也许有用——虽然没有太多可比性。

大理古城驻军某部门口也有一尊领袖巨像，玻璃钢制作、表面处理成古铜色

的，也需要毁了。销毁它决非某领导心性灰逼——已到 80 年代中期，开放许久了——而是边疆生态环境好，燕雀成群，搞得“毛主席”通身鸟粪，灰迹斑斑，不拿掉它实在影响大理古城旅游形象。毁像之前，军领导做了周密布置，也是黑夜，塑像四边用编织布围个密不透风，然后让工兵迅速对领袖实施切割，大卸数段，用军车迅速拉上苍山，投入事前挖好的大土坑，浇上汽油：烧！——火焰蓬然而起刹那，听说，一战士躲避不及，眉毛和脸部被猛扑而来大火燎过，几天未见好。他吓得诚惶诚恐地私下念佛，对人说：

啊呀！毛主席真菩萨呀！瞧，我们一动粗，老人家就显灵啦！

经过那一番“清除文革遗迹”，当年那些巨像现在所剩已经不多了，即使留存下来的也不再具有当年那种供人瞻仰、崇拜的功能。成都天府广场（原人民南路广场）上那座依然站着的巨像，就被爱打麻将的成都人呼作“东东儿”，说他那只伸出的巨手是表示打麻将一次只打输赢五块（钱），要是有人嫌少了，背后那只手就表示还可以再加五块。

---

## 【书评与序跋】

###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

####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

余汝信

这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胜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 版）能够在大陆境内公开出版，纯为一个异数。

这并非一部普普通通的那种回忆录。这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儿子，与功勋卓著而又有着独立人格的父亲的对话录。

父亲张爱萍，开国上将。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建国后主管解放军编制长达十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三十年，对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决策思维。

儿子张胜，上世纪 80 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毅然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

张爱萍的独立人格，贯彻一生。

例一，晚年与张胜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张胜问父亲：“邓小平 1975 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想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见该书 396—397 页。以下引文同出自该书，仅注页码不再注出处）1989 年，张爱萍就没有跟。（420 页）

例二，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当整个解放军都浸泡在商海之中时，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466 页）

张胜的独特思想，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如对华国锋，张胜评曰：“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407 页）

此一评价，颇为到位。

对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最有价值之处，是引用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揭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时期总参内部斗争的实情。

张胜称：“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

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308页）可惜的是，境内出版条件所限，张胜不能将迫害者直接点名，我们也就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谜。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张胜追问：“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308页）

经查，时张爱萍仍为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同为副书记的是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杨是代总长，李、王同为副总长。

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张扣押。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称：“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308页）

这“上面”，指的是什么人？

张胜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309页）

谁的签名？张胜没有说。当时谁能代表党委签名？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只能推测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3月8日，揭批“反党分子张爱萍”的“追斗会”拉开帷幕。张在会上检查称“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309页）

同日，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310页）

3月9日，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能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310页）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张胜说。（310 页）这个“他”，如无意外，指的还是杨成武。

同日，总参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310 页）

在总参，杨成武是一号首长。可简称之“首长”的，非他莫属。

3 月 10 日，以总参党委名义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送到叶群处。其中写道“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 3 月 16 日批示：呈主席阅。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 月 30 日。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原件未注明日期）（310 页）

张胜说：“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310 页）

3 月 29 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311 页）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319 页）这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谁？张胜仍然没有点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否就是总参谋部领导人？我们不能肯定。

9 月 19 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党委领导人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 10 月 18 日。（312 页）

我们已经指出，其时总参党委“领导人”即党委书记，就是杨成武。

12 月 14 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

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312页）

经查核，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是“这个领导人”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

12月18日，这个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312页）

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称“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张胜语），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321—322页）

“这位总部领导人”，毫无疑问，指的仍然还是杨成武。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自己倒台了。张胜说：“‘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

杨成武倒了，张爱萍的事还没有完。直至四年之后，1972年11月22日，方被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前此，在监护期间，使用的是“张绪”的化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重新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四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这是后话。

关于文革中的“专案审查”，张胜在书中慨叹道：“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既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

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以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328页）

张胜想要知道的，我们同样想要知道。

惟张胜没有说出来且更重要的是，“上将”充其量只是一名打手，有关张爱萍问题的重要报告，均经毛泽东本人圈阅同意。

2008年9月

---

## 【江青研究】

###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阎长贵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启发。

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

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 1967 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 年 2 月 16 日晚（或 2 月 17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语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

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都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

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国家的管理员”，“大小事都处理”。（金凤《邓颖超传》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页）“日理万机”——周恩来真是日理万机，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出版第 89-90 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 1956 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 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

### 【蓦然回首】

按：曾国一，1956 年作为调干生进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1957 年在校被打成右派分子，1961 年被判劳动教养，1963 年遣返原籍四川省自贡市，在街道工业缝纫店挣扎求生中迎来了文革。本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右派生涯》。

## 险遭镇压

### 一个摘帽右派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曾国一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自贡市和全国一样。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

无论十个八个人、百个千个人，都可以自由组成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而且上面都得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头衔。还得用“向东”、“卫东”、“永红”、“风雷激”等等“路线”鲜明的命名来突出自己的革命性。一时间“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战斗队”、“造反派”、“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多如牛毛。

“揭竿而起”之后，每个人得戴上个印有“毛泽东主义卫东革命造反兵团”之类的红袖章。出外“战斗”，尤其是举行批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大会之类活动的时候，绝对不可少的是得高举一杆“革命造反”的红旗。开始的时候限制很严，需要持介绍信，市里专门指定了一家名叫“先锋”的甲级服装门市部制造，而且还特意从工艺美术公司调了两个书法家去为之写字。全市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制造，当然也没有人敢于去冒险为造反派制作大红旗。

一天，三门市部的保管徐正容突然领着一个造反派头头来到了我们那个篱穿壁漏的旮旯，向我介绍说：这是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那时的造反派，头上大多戴一顶草绿色军帽，左臂上一个红色臂章。那是那时候的“时装”，如果还有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就是顶级的“时装”了。一号“勤务员”不来这些。穿了一套很合体的深灰色毛呢，头上也是像那种往后疏的大背头。看了我一眼，拿出了一包好香烟（大前门之类，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递给我一支。这时我看见他身后还有两个人，他的保镖之类。一号“勤务员”说：找你帮个忙……

原来这些造反派们合并成立了一个“总团”。“总团”没有旗子。过几天全市要斗争市委书记李唐基，几十万人的大会。这么一个上万人的大“兵团”，岂能没有一面红旗？所以一号“勤务员”为了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才亲自出马，来找我“帮个忙”。因为他找了好几家缝纫店，一是不准许制作，二是太深奥，没有人制作过，更怕做坏了生出些是非，所以没有一家敢承揽下来。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听说我们这个街道工业小缝纫店有个“大学生裁缝”。便找到了这风雨飘摇的小旮旯来，先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才邀着保管徐正蓉一齐来求我。

说明来意之后，我考虑了一下，怕惹麻烦，想推脱，便说：“我们做这种红旗不合适，上头也不许可。听说只准许‘先锋’独家制造，是不是请你们拿到‘先锋’去做？”一号“勤务员”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在‘先锋’去做一面旗子，要两个月才能取货。那里要做的旗子堆了几间屋，我们因为急着需用，才从那里



去退出来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我说：“这怕……”一号“勤务员”说：“明白了，你有顾虑，怕，怕什么？现在形势不同了，李唐基我们都要斗争！”他后面的人说：“现在一切都是咱们造反派说了算，有问题咱们造反派负责！”一号“勤务员”说：“你这是为革命造反作贡献，也算立功嘛。谁敢来难为你，我们完全负责！”后面那人说：“一号‘勤务员’都这么说了，你还能说不？”

徐正蓉说：“这样好了，这个活算是我接的，我分配给你做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那些人：“太好了。你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一号“勤务员”说：“但是（又递给了我一支大前门），一定要做好啊，这是革命任务，要出色完成。”我说：“既然答应了，就绝对会做好的。”后面那人说：“大学生嘛，相信你所以才来找你。”

徐正蓉说：“曾师傅收多少工钱呢？”我说，“这可不知道。”后面那人说：“要多少给多少。只是要开张发票才行。”徐正蓉说：“发票有，只是收多少钱合适？”我问：“‘先锋’他们收多少钱一面？”一号“勤务员”说：“十来块吧。”徐正蓉说：“他们是甲级门市部，我们，最多收七八块。”我说：“就收七块吧。”

临走，一号“勤务员”把那剩下的大前门递给我，算是一点小“奖励”，又叮嘱说：“帮忙了！三天，三天一定来取货！”

等这些人走后，我牵开旗子一看，是用最好的红绸做的一面大红旗。有 4 米长，3 米宽，上面用金黄色的绒布剪成的字，已经匀称地粘贴好了。字是三排。上面一排是“毛泽东主义”5 个字，每个字 30 公分大小，下面一排是“革命造反兵团总团”8 个字，每个字有 25 公分大小，这两排字用的是艺术体。中间是“风雷激”3 个大字，用的是毛体，龙飞凤舞，每个字有 85 公分大小。好一面气派非凡的大红旗！

我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些已经粘贴上的绒字，用缝纫机把它扎好。这应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其他裁缝们大都没有多少文化。对之望而生畏。所以一号“勤务员”才特意来找我这个“大学生裁缝”，而且还费了那么多的唇舌。我既然很欣赏这面红旗，于是便花了大半夜功夫把它扎好了。居然几个钟头就完成了 7 块钱的营业额，回过神来，不由得又惊又喜，高兴得傻了！

当时做一件中山服，营业额是 8 角到 1 元。这 7 块钱营业额，相当于制作七

八件中山服，要完成七八件中山服至少得七八天的时间，而今只花几个钟头就找了七八天才能找得到的钱，这不是在“捡”票子吗？

这种“刺激”不能不使得我突发奇想：既然已经做了第一面红旗，那何妨再做它个十面、百面，既然已经开了禁。还怕什么？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把这面大红旗高高地张开悬挂在那旮旯小店的大门前面，实际上这是最好的宣传广告。果然不出所料，引得过往行人驻足。消息也就不胫而走，“大学生裁缝”在做造反派的大红旗！

于是从全市只此一家变成了只此二家。“先锋”要两个月才能取货，我这里只要几天，霎时间“勤务员”们蜂拥而至。许多人从“先锋”去退了活拿到我这旮旯来。一时真是门庭若市，真怕来往的人把那吊脚楼压塌了，只好借了几张高凳，把门板铺在上面，放在大街旁边的屋檐檐坎上来接待众多的来人。为了能够最快地得到那面红旗，“勤务员”们对曾师傅当然客气异常，首先客气地先递一支烟，然后才进入下文。不两天，红绸、红布、黄绸、黄布在我这旮旯也很快堆起来了，也得等“轮子”了。你要想尽快把旗子做好，能对曾师傅不客气吗？

我们门市的曾三姨很精，她提醒我：“曾师傅，来做旗子的要他们一起做袖章，你做旗子，我们做袖章。”我说：“好啊！就这样，有饭大家吃。”我心里想这不仅是饭，这简直就是肉就是糖！当然得大家吃，我岂能独吞？

做一个袖章1角钱，做1000个就100元营业额，可得工资43元。以往他们拼命干，一个月也只能挣到20多块钱。1000个袖章也就两三天的活。也就是说，做袖章一天相当于平时做十多天的收益。这难道还不是肉不是糖？

既做红旗又做袖章。这小旮旯立即红火起来了。每个夜晚都挂起了300瓦大灯泡，挑灯夜战！把小旮旯照耀得如同白昼。那曾三姨、雷三姨实在疲倦了，便伏在那缝纫机上打个盹，她们自然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此渡无好舟，拼着命干一回实在是值得的。我自然也得到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熬下去。

不仅是我，我妻子伍淑华也“入伙”了。当此时也，小学也已“停课闹革命”。课停了、学校可以不去了，然而她没有去“闹”，迫不得已之时，偶尔才去“闹”一回“革命”。那时候我们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名之曾焰，已经两岁多了。此前找人带白天，给人一个月8块钱工资。而今停课了，为了省下那8块钱，伍淑华便挪用了这“闹革命”的时间偷偷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带。干起了做旗子这营生，

她一看许多活她都可以干，而且干起来比我快比我好：比如用剪刀剪旗子上那些字，她是得心应手。“批量生产”那“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兵团”之类字。因为每一面旗子上面都少不了的“毛泽东”、“主义”、“思想”、“革命造反兵团”这些字的。她把那些黄绸叠起来三五层。一次剪下来就是三五个，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几倍。当然中间那几个大字，那是不同的兵团的各自不同的命名，比如什么“风雷激”、“向东”、“卫东”、“千钧棒”、“永红”……当然只能一个一个地剪。而且那些团名，字体巨大，大多要求使用龙飞凤舞的毛体。必须由我去临摹、放大，干这活还颇有点费时间、费功夫……

旗子已经接了许多，堆集有如小山，然而我已经养成认真负责的性格，再忙我也绝对不粗制滥造，每一面旗子我都精心设计。无论从字体配置、字形大小比例、架构布局，都不断推敲，希望能一面比一面好。每完成了一幅红旗，就把它挂在那小旮旯外面，临着大街，迎风招展。我制作的所有红旗绝对毫不逊色于市里指定的“先锋”甲级服装门市部制作出来的。没有一幅次品。

在这大街旁边一片美观的红旗迎风招展，当然引得不少行人驻足，自然成了宣传广告，越传越远，接的活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天天熬夜，有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饭没法自己做了，全家人去吃馆子。距离那小旮旯十多米远近，有一家名叫“合力”的小店，三顿都在那里吃。早上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有白萝卜烧牛杂、红萝卜烧猪大肠、豆花。晚上有点卤猪头、豆腐干之类。这实际上是家低级的饭馆，裹腹而已。可是此前，我们是从不敢问津的。目前主要是要忙于赶活，没有时间，同时“量入为出”，预计干完这些活计能挣到不少钱。

我这小旮旯天天宾客盈门，夜夜灯火辉煌，通宵达旦。不仅使得对面一门市部的大大惊讶而且急红了眼，这样的活计他们连一样也捞不上做，根本没有谁去找他们，真乃气煞人也！更叫他们气煞的是发工资的时候，第一个月我进了100多，第二个月我进了200，曾三姨、雷三姨都进了100左右。太惊人了！那年月市委书记李唐基月工资有100来块钱，章伯钧当了大右派分子，国务院的正部长垮了，降了三级，从四级降到七级，月工资只有150元，溥仪皇上特赦以后当了公民，被安排在国家文史馆做文史研究员，月工资才100元。而我的工资比溥仪皇上还多。如此的高收入，使得一些人不仅眼红甚至气忿。上下都知道了，有些人又去“反映”。于是惊动了街道办事处，来人一查，确实有那么多工单，确实

干了四五百块钱的营业额，就是应该得那么多的工资，其奈我何？

小旮晃灿烂辉煌了好几个月……

造反派“雄”了几个月，我看见他们高举着我制造的那些美丽的红旗，招摇过市。冲过来、闯过去，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千万之众喊着口号，高唱歌曲，似乎这世界真成了他们的了。

造反派雄起的时候，造反派求我为之制造造反大红旗；造反派被战斗军（保守派）打倒了，战斗军把造反派的旗子全部都焚毁了。战斗军雄起来的时候，也求我为之制造大红旗；战斗军又被造反派打倒了，战斗军的旗子也随之被造反派焚毁了。造反派重新又来求我为他们制造大红旗……在造反派和战斗军争夺厮杀、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的这几个月里，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一会儿为造反派，过一会儿又为战斗军先先后后制造了几百面大红旗。几个月里，找了相当于一个“鸡干部”（指普通干部，当时因黑市上一只鸡要卖到三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所以民间把普通干部戏称为“鸡干部”）一两年才能挣得到的工资。从而能得以暂时摆脱那饿死人的困窘。

造反派群众组织奉命解散之后。我自然就失去了这桩业务。

有一天下午，住在我旁边小院里的几个年轻人，站在我那小窝旁屋檐下吹牛。平时他们吹他们的，我远远地在我那小窝的屋檐下，“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扰。那天真有点“鬼使神差”，我手中没有活干，无意识地凑过去听他们吹些什么。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几年前被招工去了云南。这回是回来休假的。他忽然对我说：我从昆明带回来两段灰色卡叽布。想做两件衣服，不知道哪里做得好些？我说：正街几家甲级门市部啊。

闲谈间，我发现那姓李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很是新颖而别致的上衣，我审视有间之后说道：你身上这件衣服还不错嘛！在哪里做的？姓李的年轻人说：不是做的，是买的。昆明买的。哎哟！太不好买啰。那天听说昆明大百货公司只到了一百件，很多年轻娃儿都去买，拥挤、抢购，把柜台都挤翻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了这件。这种卡克衫只有上海一个地方会做，全国没有任何地方会做。所以也只有大城市偶尔才能够买到。

姓李的年轻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这在当年确实是非常稀罕的，新颖而又别致的服装。当年所有男性穿的，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山服亦称毛

服。全部清一色的青、灰、蓝三种颜色。所以姓李的年轻人穿上这么一件卡克衫，十分引人注目。我说：“就照你身上这种样式做两件嘛！”他说：“谁会做？开玩笑！全国都只有上海一地会做。”我说：“正街上那些甲级门市部高级师傅有的是啊！”他说：“我去问过啊！没人敢做。他们都说根本做不出来。太复杂了。我倒是真想照着这种式样做两件，没有地方能够做啊！”

我突发奇想，说：“我照着这式样给你做两件……”

他有些惊愕而又惊喜地瞪着我说：“好啊好啊！太好了！我马上去给你拿布来！”说着一溜烟跑回家去，拿来了两段质量色彩俱佳的灰色卡叽布。那在当年确实是难以买得到的。大家在鉴赏之余，又打量那件卡克衫。还叫他脱了下来，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审视。这确实实是一件别具一格的卡克衫，其制作之难，之精细，设计之巧妙，之精心，款式之新颖别致，之美观大方，在当年毛服一统天下的“时装”界，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中，不只别具一格而是鹤立鸡群。年轻人早已经厌倦了毛服这种一统天下的格局。不少人都已改穿卡克衫，然而一般的卡克衫式样也太泛泛了。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无论从设计构思、工艺制作，即使在 21 世纪的现在而今各式服装万紫千红、鲜艳夺目、奇装异服遍布天下的情况之下，也绝对是堪称第一流的。

我把那衣服翻过来、翻过去认真审视，其难度之大，真令我有点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我连最起码的裁剪知识都没有，连一件上衣都没裁剪过，而只会踩缝纫机干最低级的活计，实在是还没入门的“裁缝”，稍稍凭一点点理智，都应该知难而退。然而能退吗？大丈夫，一言既出，能说不吗？真是骑虎难下！

我说：“你把衣服先放我这儿，我看一看，我一定给你做好，做坏了我赔你。”然而我心里想，这么好的卡叽布买也买不到，真的做坏了，我怎么去赔呀！

姓李的年轻人却说：“赔啥子啊！你大胆做，做坏了就算了。”另一个年轻人说：“大学生，不用客气，相信你才舍得给你做，过几天我还来做一件。”

这几句很平常的闲谈却使我极为感动，本来是很珍贵的卡叽布，却突然给我说“做坏了就算了”，能不令人感动吗？使我感到这世间“狗”还是少的，人还是多的，

把这件卡克衫拿回家里，我仔细研究了一番。认真解剖了一番，总结出其能以单层布而却能双面穿，翻过来、翻过去都同样显现出是“正面”的诸多奥妙。

当时的上海服装研究所是全中国唯一的服装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后，服装研究所在全国各地才如雨后春笋般地花开满地。这件以单层布而能双面穿的卡克衫，不知道花费了上海服装研究所的师傅们多少心思，多少实践，才得以成熟定型。这绝对可以称之为服装史上一次创造性的成果。然而 60 年代的中国没有“专利权”，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之类，我只不过以“反向”探求的手段，从成品去追溯出它的初始状态。先认真“解剖”它的工艺制作，再仔细地一一比量了它衣片各个部位，有如把一架钟先拆卸成零件，再把它组装起来。心中有数之后，便麻起胆子下刀动手……

整整两天。哎！当然，少不了许许多多的周折，第一件做出来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我所说的“成功”，并不是仅仅指模仿那件卡克衫，能够依样画葫芦比照着大同小异地做出来了一件。我所说的成功，其含义要更为深层次得多。在那样严峻的生存环境里，我连去寻求犬彘之食以求吊命、以求生存，都是那样艰难。我曾经寻求出卖、最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技能都不可得，现在能在生计无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杀”开了一条血路，并因此而改变了我的生存条件。虽然辛苦劳累，然而较为安定地在这人间最底层生存了下来。我更加坚信，人，作为万物之灵，在任何险恶的境况里，你都必须不屈不挠，利用上天赋予你的万物之灵的灵、勇、智去“杀”开一条血路！在我这样充满血泪的生存奋斗史上，呼喊一声：我成功了！！这是一声充满自信、充满欢欣、也充满酸辛的呼喊！

有了这第一件的成功制作，从此揭开了我“摘帽右派生涯”一段崭新的历史。为我这小舂舂的窝，谱写了一页“灿烂辉煌”的篇章！不久前制作那造反派的红旗，那是从全自贡市只此一家，变成只此两家。而那制作没有多少奥妙可言。而今制作双面穿拉链卡克衫。1969 年，全中国就只有上海一地会制作。现在是从全国只此一家，变成了全国只此两家。我是使用了（不能说是剽窃吧？）上海服装研究所的师傅们花费了大量心血而得以成功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在偌大个中国还有这么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落魄者，使用了他们的此一研究成果而得以生存了下来。

我制作的这第一件与上海那件比较而言，实在是太差劲了。然而就其工艺而言，却与上海的那件完全一致，就这一点，我取胜了。

没有几天。第二个顾主来了。来人名叫史五。在自贡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地头蛇，貌不惊人。一副笑脸。丝毫看不出什么地头蛇的形状。客客气气地称我师傅，递上好烟。客气地说：麻烦师傅，给我做一件李五穿的那种双面穿卡克衫。听说只有你会做，太好了。

我很快就给他做了一件，比较给李五做那两件又长进了不少。这史五本来就是有名人物，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

于是，问着找着上门来的日益增多，当然都是些年轻人。先是市中区的年轻人，然后贡井区、大安区……先是市内，然后市外。当时各地的学生还没有复课，学生们还在游荡，他们来来往往的所到之处。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而那时候能够买到一段卡叽布已很不易，制作一件称心的服装就更难。尤其是这种卡叽布，因其耐磨，故而耐穿，以前只能单面穿。面子的颜色已经洗旧了、洗白了、洗得褪尽色了，而不能翻过来穿的里面颜色还是新的。而今可以翻过去穿，翻过来穿，而且两面的式样又“各有千秋”，似乎一件当了两件。加之我收的工钱非常合理。街上做卡克衫工资收1元一件，拉链卡克衫收1元3角5分一件。我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只收2元一件，其实就当时情况而言，我收的价格也定得太低了点，从其制作之难度，工艺之高度而言，我即使收3元、4元、5元，都是合理的，也一定都有人来做的。然而我这人生性不贪婪，给李五做的第一件我收了他两元钱工钱。从此之后。我仍然每件只收两元，再繁荣、再忙碌、再疯狂的时候，都只收两元一件，从未多收。而在制作上，却力求精益求精，一件比一件更好。如此一来，自然生意日益兴隆，逼得我又只得熬夜了……

我租用的那台旧缝纫机用来制作这种服装，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机械太破旧，转动速度太慢，针脚效果太差。生意日益兴隆后，一次有个百货公司的年轻人来做衣服，看见我使用的缝纫机如此低劣便说：怎么不换一台？我说：买不到啊！有钱也买不到啊！他说：是啊，这好几年都没有卖过缝纫机了。不过，我们公司最近要到30台、说是上海的缝纫机厂“抓革命促生产”才恢复生产的、听说还是新产品。不过，可能我们公司里的头头，“后门”开得都差不多了。——那年代，一切物资紧缺。许多东西公开拿出来卖的没有，暗地里卖，卖给有关系的人、有权势的人、亲朋好友等，叫做“开后门”。

那年轻人说：你想要的话，我去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给你搞到一台。我说：

得多少钱？他说：听说 160 多块，但是还要 30 张工业票。我说：钱可以借（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要想拿出这么多钱来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怕“露富”，我只能说钱可以借），只是这 30 张工业票难找！太难找！——你想想，一家人一年只发两张工业票，30 张得 15 家人的，哪里去弄？他说：买得到。1 块多钱一张，不就是多个三四十块钱嘛！加起来也要两百多块钱。你还可以叫那些娃儿去给你想想办法嘛。

那时候，来做卡克衫的娃儿们，已经与我朋友相待。四面八方闻风而来，我那昏晃本不好找，真乃“酒好不怕巷子深”，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成都、重庆、南充、宜宾……这些地方的年轻娃儿凑集三五件、七八件的衣料，专人“不远千里”而来。然后预定好时间，再专人来取。我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正因为我的诚信、我的认真、我的不卑不亢，得到了这些娃儿们的友善和尊重。有好些个都对我显出真诚的平等的友谊。这是很不易的。我更加感到这些娃儿人性是丰富的，当然也遇到过极少数的“狗”，那是他“娘老子教的”。对于这类“狗”，我是“去你娘的”，把拿来求我做卡克衫的布扔将出去，老子不给你服务！其奈我何？

新缝纫机买回来了，真是如虎添翼。有了它，工艺质量大大提高了。制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旧缝纫机一天做两件得熬到深夜，新缝纫机一天可以做三四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制作也日益熟练，熟能生巧，加上我精益求精的秉性，成品越来越精美。一年多两年的含辛茹苦，我的产品与上海买回来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我可以无愧地说：全国只此二家！

我家里堆积的货越来越多，来我这里制作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至少得等待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取得到衣服。平均而言，我一个月最多能制作 100 件，我那窝到处都堆垒着等待制作的卡叽布。约定了的取货日期我必须无条件遵守。不能让那些娃儿们白跑（特别是一些外地的，要跑千里之遥）。我那窝实在太小了，我便在那小窝的屋檐下放置缝纫机。门前有一块一二十平方米大的小小地坝，那是几家人共有的。在我那小窝里面自然摆不下一张案板。只得在那小小地坝的露天下面，借几张高板凳，借一张门板铺上去权当案板。这些东西都是向隔壁一家叫缪松银的工人师傅借的，缪松银是自来水管厂的工人，富人性，以前对我娘也平等相待。每隔四五天，我必须在那露天坝摆上门板，去裁上一天。我也就必须去向缪松银师傅家去借。每一次去借。他们家都从无怨言。



每当我在那小院坝里裁剪的时候，常常都有一群年轻人来围观，说说笑笑，小院立即热闹了起来。当然其中不少都是等着轮子取衣服的。为了能够提前得到衣服，便有来套近乎的。我儿子曾焰转眼好几岁了，送他玩具枪、玩具车、零食之类的不少。

距离我家那小门两三米的地方，这一两年间真是“一晃”长出了一棵“参天”大树。这里本来是个光坝坝，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一家人砍了一根黄葛树棒棒，像打桩一样钉在地上，本是想用来晾衣服用的。棒棒上端留了一个枝丫，晒衣服竿竿一头搭在那树棒棒的枝丫上，另一头搭在屋檐上。曾几何时，棒棒长成了一棵大树。先是长得来高过了屋檐，然后再高过了屋脊。越来越茂盛，树冠越来越扩展，长得来有如一柄大大的绿伞，绿荫荫的把那院坝掩盖了一大半。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绿伞就像是特意为我而长出来的，我在那绿伞下制作、裁剪，免去了烈日侵扰，最令人叫绝的是在那棵黄葛树茂盛的枝叶间，迎来了“百鸟朝凤”。每当黄昏时分，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投向那黄葛树上。密密麻麻不下千百只。在这城市里稠密的房屋丛中，如此一个不起眼的小坝，如此一棵不起眼的黄葛树，竟引来了千百只麻雀，如此热闹，如此兴旺地聚集在这里，人们都认为是非常稀罕的吉祥事情。

制作一件卡克衫收取工钱两元，一个月熬更守夜精疲力竭制作百来件就可以换来两百来块钱。在那年月实在有点“吓人”，真是非常“吓人”，因为这两百来块钱相当于四五个“鸡干部”的月工资；相当于两个市委书记的月工资；接近予中央一个司级以上副部级以下的月工资。相当于溥奕皇上被特赦当了公民之后，被安排做国家文史馆馆员两个月的工资！这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不是反常的“骇人听闻”吗？至少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罪名。一个被打入了“另册”的只应该苟且偷生去“享受”犬彘之食的“人”。竟也可以拥有去买那高级的“黑市肉”，“黑市粮”的能耐！当然使得不少人眼红，更使得特权拥有者所不容。就当时的“政策”，社会理念，思想观念等等。都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

我这样含辛茹苦、熬更守夜、凭籍我的知识和劳动，为谋求生存而挣这么几个钱，却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制作的那种美观、大方、新颖、别致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被自贡市的某些文革头头定为了“奇装异服”。制作“奇装异服”的我，

属于予以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市里的“大案”，轰轰烈烈地来抄我的家，把我抓起来，大张旗鼓地游街示众，许多人说：这回死定了！

也真是咄咄怪事，当我被抄家，被那千百之众鼓嘈喧天来围观抄家之际，那种“煞气”定然冲犯了这小坝子里那颗黄葛树上的“灵气”，当我被抓走关起来之后。那千百只可爱的麻雀，那千百个神奇的小精灵竟全部飞走了！一去而不复还！我可爱的神奇的小精灵啊！你们去向何方？那美妙的音乐般的叽叽喳喳的动情倾诉！多少个黄昏、多少个长夜、真令我魂牵梦绕啊！

当我听到要挨整的风声后，照做不误。没有办法，满屋都堆满了等待制作的卡叽布，每天都有人来取衣服。我很讲信用，再熬到夜深也给人按时取货。当然制作一件就能收入两块钱，有了这钱才能活命。这是最主要之点。我必须照样加班加点，不能停歇下来。有一天，一个亲戚特意来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市公安局，昨天，全市公安部门在市里开会，通报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被在全市公安系统大会上公开点名，其罪名是：“右派分子进行阶级报复，专门制作奇装异服毒害青少年”。这是弥天大罪，罪可至死的现行反革命罪。我感谢她的通报。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儿。都得靠这点营生来活命，我能扔下他们不管吗？我能逃跑吗？

1960年，学校当局要“宽严结合”，准备摘去两个右派分子的帽子，送两个右派分子去劳动教养。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又拒不认罪、顽固不化、毫不低头，理所当然地被当局归入了杀鸡给猴子看的对象。赵德华（右派老师，民主同盟的盟员）不知怎么获悉了此“情报”，一天下午，很神秘地来到了我们那间右派分子的大寝室。这是他第一次“冒险”光顾此处。他跟大家随便聊了几句，悄悄把我叫了出去。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僻静的一处树林间，如此谨慎小心，我想恐怕有什么重要的话要通报于我。赵德华怕把我吓着了，转弯抹角地说了一阵，最后终于给我通报了。听到后，我非常坦然，丝毫没有惊恐的表现。我的坦然反而使得赵德华诧异了，他怕我没有完全明白他说的，没有完全明白我面临的可怕处境，只得更直接了当地说：“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学校当局要送两个，两个！去劳动教养三年，材料已经上报了，很快就会批下来……”我说：“这能怎么办呢？逃跑吗？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知道有许多“西北盲流”，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冒着艰难险阻逃

亡到大西北、新疆、青海等生存条件极端恶劣艰辛的不毛之地去挣扎。但那是一条不归路啊！我还牵挂着我那老娘呢！当时我那个“反党集团”的一个女右派王舜中，本来是在一个县团委工作的干部，调干上大学的。在“帮助整风”的“反党活动”中很能干，右派分子而又身为女性，鹤立鸡群。那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低头抬头都难以躲避群众“雪亮的眼睛”。无可奈何，终于跑了，跑得机智而勇敢，跑了两天才被监视她的革命群众发现。也不知道跑去了何方，几十年迄今杳无音信（祝愿她还活着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说：“赵老师，太谢谢你了，你是耽着风险来告诉我的，但是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逃跑，我能怎么办？可是我不能逃跑啊！我还有一个老娘呢……”结果只得以蒋介石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等待着挨宰……

这一次，我照样不能逃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活计照样干，钱照样收，生活照样改善。这两年，我是真正地孝敬了一下老娘——不时买几斤高价的黑市猪肉，给她个一二十块钱，买十来斤黑市高价粮票去看望她一下。能力也就仅此而已。然而这对于她那处于农村里的最穷困的生活却是非常难得的补偿。

这个可怕的情报，我没有向伍淑华通报，怕她承受不了。只是买了一台新缝纫机放在她娃儿们住的那个家里。给了几个钱叫她存放起来。以防不测，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仅此而已。

疯狂而残酷的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那是公安局、市管会、税务局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经过精心策划，先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一清早有人来通知我去市管会开会，把十几家的缝纫单干户都一起通知去了，还指定我作组长，布置了一个学习文件，叫我读了，还要领导大家讨论。吃过午饭，正在讨论。市管会一个人到学习会上来叫我：你家里说你的电话，赶快回去接。这个谎撒得太有点蠢了。那年月的电话非常稀罕，一般干部家没有电话，老百姓更没有。市级头头家里才有。我家没有电话，谁会给我来电话呢？要抓为什么不在这里把我抓起来呢？叫我回去干什么？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对，抄家，一定是抄家！抄家我倒不怕，我那样的家，还怕你抄？我只担心那野蛮的抄家，会吓倒老婆和孩子。他们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孩子才几岁，汉子做事汉子当，我只想赶快回去承担那一切野蛮的压力。

从市管会到家有 20 多分钟的路。我判断一定有人尾随，便加快了步伐，头

也不回一直往前走。当我走到原来下牌坊的旧址旁边，距离我家还有三四百米远近，只听见大喇叭不停地呼叫，成千上万的人把大街压断了。我那小窝在光大街的坎上。坎高有十多米，有一条之字形的石梯坎往上走，那梯坎有 20 多梯，石梯坎上布满了警察，不让人群再往上面挤。那小坝周围也已经站满了几百人，引颈踮脚在向着小坝中间观看，一些警察站在小坝子四周不让围观的人再往前面挤。我走入那压断街的密密匝匝的人群中，一边往前挤，一边喊：请让，请让……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嚷嚷：“抓美国特务啰！”当年在老百姓的概念中，“美国特务”是穷凶极恶青面獠牙，如此大的阵仗必然是抓美国特务！有认得我的人在人群里说：“就是他，就是他……”有人说：“抄了十几支枪……”“还有金条……”

我终于挤上了坎，小坝子上已经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物件，那准备制作卡克衫的 100 多段卡叽布堆了几大堆。缝纫机放在那黄葛树下面，一个市管会的头头叫宋什么的人，借了一张凳坐在那缝纫机前在登记。果然有十多支枪放在那小坝子中央，不过那都是年轻娃儿们送给曾焰的玩具枪。还有一辆军用小吉普车，当然也是儿童玩具车。那年月，儿童玩具十分稀罕，能够有一支玩具枪已经很不易了，而今竟堆积了这么一大堆，自然十分使人惊讶，其实这些玩具枪一支也不是我买的，全是从重庆、成都等地来找我做衣服的年轻人送给曾焰的。因为知道我很金贵这个儿子，乃联络感情之物也。对于那 100 多段布料，那头头登记不下去，所以叫我赶快回来。因为对于那 100 多段卡叽布，他满以为每一段布料中定然有一张纸条写着姓名、尺码等等“私制发票”之类——抓着私制的发票，那是重罚的依据。然而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他大惑不解，不知道该怎么登记。

那头头问我：“这些布干什么用啊？”“做衣服啊。”“这些布谁是谁的啊？做什么啊？什么时候取活？你凭什么分辨清楚？”我说：“凭记忆。”他说：“记忆，你记得那么多吗？你少说也做了几千件嘛。你没有搞错过？”我说：“从来没有，一次也没错过。”确实如此，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什么条子之类。几千件往来定货全凭记忆。当然在那每段布上面还是用画粉画上尺码、符号之类他人不知所云的“天书”。来做衣服的娃儿们从来不向我索取什么凭证，我也从来不给。可从来没有任何人来冒领过。确实从未出过任何一次差错。一是我的记忆力实在不错。二是年轻娃儿们绝大多数人性为本，狗性的极少。曾经发生过想冒领的，但逃不出我的精明。往来已成“君子之交”。他们对我客客气气我对他们和和气气，相

互尊重，要想得到一件高质量的称心衣服，能对曾师傅不尊重吗？

那头头无奈但又必须登记。他说：“这么多布怎么登记呢？”我说：“那是你的事。”他无奈，便叫人数多少段，又叫我数。我说：“我不用数，数了也没有用。有用吗？”他又登记那些玩具汽车、玩具枪、小人书之类。我说，“这些你也要吗？”那头头怒视了我一眼，狠狠地说：“你放老实点，谁要？这些都是赃物。”我心平气和地说：“娃儿的东西怎么也是赃物？”他有点恼羞成怒，吼一声：“你还这么嚣张！”这时候他看见我手上带着那块金表，又对我吼一声：“把表取下来！”我说：“这块表是我在凉山剿匪负伤住院买的，算是革命流血的纪念，一直就没有取下来过，你也要？”他又吼道：“取下来！”旁边一个警察恶狠狠地站过来吼道：“快取，取不取？”我心里想，他妈的，真是土匪！当然只敢于“腹诽”了。谁还敢还嘴？横眉冷对说不定也会赏赐你一拳头。那警察又吼叫，我慢条斯理地取下了那块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下都没有丧失过的纪念之物。就这样，这纪念之物被无理地吃了！

折腾了几个钟头，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耐心地坚持着在欣赏这场抄家的闹剧。最后，一群警察把全部抄家之物抬下坎，抬上了早已停在下面的一辆大卡车。一个警察叫我：“你也上去！”我说：“去哪里？”警察说：“去就知道了。”

我被挂牌游街，弄到十字口（那时候叫英雄口，专门斗争、示众的地方）去示众，示众之后又弄上汽车在全市大街绕行，大喇叭开道，宣称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然后我被关进了凉水井。

我被抓到凉水井的时候，不知道那地角叫个什么名目，监狱？看守所？“牛棚”？或许就没有名目。里面被抓进去的有近百人。抓进来的人从来不兴什么拘留证之类，要抓就抓，我这样的“五类分子”，本来就是“专政对象”，早已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随时都可以再踏上另一只脚的……

我被塞进去时已经天黑了，押解我的警察把我交给里面的警察。里面那警察便搜身，身上有好几十块钱，搜去了，一切搜光，还有一包没有抽完的好烟。那两年因为做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能找钱，便买些黑市上的好烟来抽。我又渴又饿。跟那警察讨吃的，没有，要点水喝，没有。就这样渴着、饿着被关进了牢房。近百人关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大屋里，左、右两排大铺，上、下两层密密匝匝挤塞着近百人。那警察胡乱指了个旮旯叫我挤进去。又渴又饿，加上满屋里

污浊恶臭令人发呕的尿臭、汗臭，潮湿、缺氧，令人窒息难耐！

此情此景，往往会使人蓦然回首。20岁那年当五通桥市团委宣传部长，30岁那年以“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实乃“莫须有”的罪名，在重庆被判劳动教养关进了成都监狱。今年40岁，却因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自食其力劳动，而莫名其妙地被塞进了这不明不白的地方！

我必须顽强地活下去，不能够不明不白地冤死，我既无法像诸葛亮那样“躲进隆中”，我就只能也必须不屈不挠地韧性战斗下去。在这无法无天的文革时代，我也要寻求“合法斗争”、“合理斗争”的机会和途径。即使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势之下，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必须挣扎抗争！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被关之后，那些娃儿们天天去找市管会、找公安局，找抄我家的那些人闹，去要他们的卡叽布。当局本来打算结案以后再考虑如何处理，娃儿们闹得无法，也没有任何理由敢于“吃”得下这些娃儿们的东西，怕“影响不好”，几经研究才决定退还给那些娃儿。但每段布料上没法分辨谁是谁的，所以只得叫我自己去发。

一个警察把我押了出去。100多个娃儿等在那里。市管会那姓宋的头头先讲话，然后叫娃儿们对我的“罪恶”进行批判斗争。竟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说，不批判斗争今天就不发了，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脑羞成怒走了。娃儿们哄嚷起来。另一个下属的，说声不许闹，等一下。跑出去又跑回来，叫我：发！我拿一段布，问一声，哪个的？下面的娃儿都在审视，有人说：我的。我一打量，认识的，眼熟的，立即给了；眼生的，便问一两句。我凭记忆、回忆、判断便给了。不多时候，那100多段布，100多个人，打发得清清楚楚，散了。

那头头很不放心地来问，发没发错？我说，不会吧？那头头又很不放心地问，你的记忆不会有错？我不屑于回答他，便沉默着。我看出来那头头怕出错，错了那些娃儿肯定是去找他而不是找我。但我还是很自信不会出错。我还是相信娃儿们的人性，他们不会、不能、也不敢糊弄我。事后证明确实毫无差错。

每天早晨7点，被关押的这100多号囚徒，全部被赶到坎下一个小坝子去排队跑步。要跑上半个钟头，然后才给早饭吃。很清的一碗稀饭和一盘老叶子“菜”，八个人蹲一圈，自己分着吃。三顿都是如此，犬彘之食。都叫饿，饥饿难忍，被

囚禁在那“大墙”之内，难忍也只能忍，给你吊着命呢。年轻娃儿占了大半。都是知青，不愿在“广阔天地”里“修地球”，跑回城里来，生活无着，便干起了偷摸扒窃的勾当。于是结了帮，有了头……一个叫汪癞壳的知青，在自贡市当时的扒手群中颇“知名”。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大街上天天发生的新鲜事颇多，经常都有拥挤看热闹的时候。遇到这种场合，汪癞壳一挤进人群，一霎间就能掏走一二十个包，一边扒一边抠出心（钱），扔掉皮（钱包），热闹还没有完，汪癞壳已经满载而溜也！还有好几十个，他们全认识我。因为不少在我那里做过卡克衫。以前只知道他们是知青，还不知道乃扒道中人。因为他们来和我打交道的时候，都从来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因为国庆节将临，那时候的常规，凡国庆、元旦、春节之前，都得大抓一批偷摸扒窃、杀人放火之徒。在节日前夕来个杀、关、管，威慑一下，以儆效尤。所以汪癞壳之流被抓了一大堆进来。

我被塞进去了一个多月，根本就没有人来过问，真乃度日如年。有天，我问汪癞壳：要关好久？怎么问也没人问？汪癞壳说：你才来好久啊？在这里“泡”一年半载的都有！

把人关在这里，不闻不问叫做“泡”。我说：我怎么遭得住“泡”啊？我还有老娘，还有老婆孩子。我得供养他们，难道就只能任他“泡”下去？汪癞壳说：听那些娃儿说，你是大案，是“一打三反”运动抓的“现行反革命”典型，搞得不好这个国庆节怕跑不脱（意思是要挨枪毙）。过了一会儿，汪癞壳又好心地悄悄给我说。你该考虑一下“后事”，娃儿们都在说，你这回怕是死定了！

那年代以莫须有罪名杀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更何况我这个右派分子，即使草菅人命也无人会为之叫一声冤枉的。我说：难道他们问都不问一下？汪癞壳说问还是要问的，又说你到底是啥子……哎，不问不问，说是抄家还抄了枪？我说娃儿耍的玩具枪。汪癞壳说你会写，你不如“主动交待”，你自己先写上去，如果有人看……你看现在抓了好多嘛，他们连问都搞不赢，哪个晓得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来审问你呢？你写个材料还有可能把轮子排上去……

我想，汪癞壳说的不失为唯一的办法。但是该怎么写呢？考虑再三，我决定以攻为守。

我的“交待”，大致如下：一、毛主席最高指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我老老实实劳动，寻求生活出路，正是听毛主席的话，正是按照最

高指示办事。二、我做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是按照上海服装研究所研究设计的，由上海国营百货公司制作的，而且在全国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的国营百货公司售出的。因此绝对不是什么奇装异服。如果是奇装异服，国家能容许制作？容许出售吗？自贡市百货公司最近也出售过，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能出售吗？三、自贡市的国营服装店，最近派了一些很有手艺的师傅去上海，专门去学做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还会专门派人去学习制作吗？因此，把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说成是什么奇装异服绝对没有根据。四、我到底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从 1963 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乡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奉公守法，绝无任何作奸犯科之举，一直在努力自食其力，争取做个好公民。毛主席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请求调查清楚，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

材料交上去又一个多月了，依然毫无响动。冬天寒冷，我 1954 年在凉山“剿匪”时腹部留下的伤口发痛。有天早晨叫起来跑步，我实在起不来。汪癞壳叫我快起来，我说：“伤口痛，起不来。”汪癞壳说：“那你就不要起来，我去给你请假。”早跑以后，汪癞壳又来说：“你睡在这里，不要起来，我去给你端饭。”他端来了一碗稀饭，又说：“我去给你请了假，叫他们派人送你去医院看病，别说你那是‘剿匪’负伤，一般的病都要送医院去看……”

果然，午饭以后，汪癞壳几个人被叫去了。不多一会，把我扶了出去。下面有一辆架架车（人力板车），叫我躺到那架架车上面去，汪癞壳几个娃儿拉着架架车，由一个警察押着，把我拉到了二医院。看了病，又用架架车把我拉回来，已经天黑了。到了夜间，所有的囚徒都睡了，汪癞壳悄悄过来，塞给我一个糖饼。在那种地方，整日整夜饥饿难忍，这么一个珍贵的糖饼真是赛过了山珍海味！

过了两天，汪癞壳又去帮我请假，又由一个警察押着，几个娃儿拉着架架车，又去二医院看病，晚上汪癞壳又悄悄塞给我一个糖饼。我有点明白了：汪癞壳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要拉我去看病？一出去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总有办法躲过那警察的眼睛，去施展他们高超的伎俩。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道破，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们，但我这病还继续看下去吗？

春节快到了，警察人手不够，一去看病就得半天，他们也厌烦了。有一天，一个警察来叫我：“所长叫你去。”我去到了办公室，一个穿着蓝色毛服的中年人，看上去 50 来岁，不像一般的警察。问了我几句话，语言比较和气。我想，可能



就是汪癞壳说的杨青山了。杨青山本来是自贡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现在砸烂公、检、法，被贬到这个什么所里来当所长的。我把腹部的伤口情况，目前状况简单说了一下。杨青山沉默着。我说：“我的伤口，请你检查一下？”杨青山微微点了点头。我便脱下裤子，长长的几条伤口明显地裸露在肚皮上面。杨青山审视了片刻，示意叫我穿上去。我慢慢穿着裤子，弯着腰。

杨青山说：“你先回去治病，啊！”

我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杨青山，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你是杨检察长？”杨青山说：“你回家里去治治病，啊！”我说：“什么时候呢？”杨青山说：“现在就可以走。”我说：“我还有床被子。”杨青山说：“去拿吧。”

就这样又把我放了。那些娃儿无不惊讶，不是说是“现行反革命”大案吗？要挨枪毙的么！怎么这样便宜就放了呢？惊讶之余，都露着笑脸轻轻摇摇手向我致意。当时，被抓进那个地方去的，有这么一句话：“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这么便宜就把我放了。他们当然惊讶。

我自然心中也不无诧异，我想我那篇“交待”材料，可能起了作用。杨青山到底是市检察长，属于还有理性的人。虽然被挤兑下来了，是非善恶还是有尺度的，理性还没有被埋葬。

“软”斗争的结果，我又一次争得了苟延残喘去谋求生存的权利！

回到家里，小门还锁着，后来才听说，即使这么一间房不像房屋不像屋、比贫民窟更贫民窟的8平方米小旮旯，在我被抓进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革命群众”都认为我是“死定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了，所以已经有不少人觊觎于它。而且还向有关人员送去烟票、酒票之类，想把这小旮旯弄到手。只因房管局不同意，始未能易主。

艰难寒酸地又过了一个春节，从凉水井被放回来一晃两个月了，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来管，被抄家拿走的全部物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缝纫机，我还得依靠它谋求生存。我那块金表是革命生涯的纪念。还有那十几支枪。凭什么抓我？你们不找我，我得找你们。

我找得他们厌烦了，天天找，我要吃饭。找得他不得不把缝纫机发还给了我。那块表呢？上税了。我每个月都上过税的，仍说是偷税漏税得罚。用那块表抵税，就这样，那块表不明不白地被“吃”了。我还有那些书呢？那十几支枪呢？你有

完没完？等待处理！你的问题还没完！其实，也就这么完了，不明不白把我抓了进去，又不明不白把我放了出来，还不明不白地把我那块金表“吃”了！

---

【昨日心迹】

##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一)

陈懋智 著

陈琳、陈仁德 整理

陈仁德、何蜀 注释

按：陈懋智（1916—2005），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人，出身书香世家，坚持写日记达70余年。文革初期从四川省忠县财政局退休。1967年6月到重庆探亲，因重庆造反派组织间爆发大规模武斗，被阻于重庆一时难以离开，在1967年6月18日——10月27日的日记中，陈氏以平民的视角记录了武斗期间的见闻和社会心态。全文共4万余字，本刊分五次连载。需要说明的是，为保留日记的“原生态”，除个别明显错字外，本刊对其他语词问题不做任何加工。原文中不清的字以□代替。

### 6.18

下午6点上船（注：作者从四川忠县上船前往重庆探亲），得玖、仁德、仪德、俊德、珊侄（注：得玖，作者夫人李得玖；仁德、仪德，作者次子、三子；俊德、珊侄，作者侄儿、侄女）送至江边。

### 6.19

中午 12 点半到渝，小雨。在二哥（注：作者内兄李得钊，时居重庆牛角沱嘉陵路 39 号）家停留三四小时即去大渡口（注：重庆市大渡口工业区，重庆钢铁公司所在地）十弟（注：作者弟陈懋新，时居重庆大渡口区渝钢村 65—3 号，十八冶干部）处。琳儿（注：作者长女陈琳，时同船到渝）晕车不适。

## 6.20

整天大雨，十弟主张去成都。

## 6.21

下午七点进城，十弟送至杨家坪车站。

## 6.22

8 点去车站买票排队太长未买成。上午进城买好车票，302 次慢车。进城在解放碑几乎碰上武斗。双方打手严阵以待。很巧碰见惠德侄，一路耍。她明天回忠县，便给得玖一信。晚 11 点 10 分送琳儿上火车。给八哥（注：作者内兄李得鐔，时居四川乐至县）一信告琳儿已去泸（注：四川省泸州市，作者夫人李得玖的家乡）。中午参观大礼堂（注：指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晚 12 时在体育馆碰上武斗骇坏我。

## 6.23

整天大雨，料琳儿已平安抵泸。晚去上清寺听广播。据广播重医（注：重庆医学院。1967 年 6 月 23 日上午，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武斗，该小学被烧毁，武斗中死 4 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 3 万余元）下午 2 时大火，发生武斗。天黑后双方又派人去增援准备大打。明天晴了返大渡口。

## 6.24

晴，上午 8 时半从李二哥家动身步行来大渡口十弟处。12 点到达。沿途看大字报。在大坪听一目睹昨天重钢起火死伤人的情况。在杨家坪遇空压厂（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工人 7 名伤后返厂，血迹未干，沿途观者如堵。傍晚与十弟去跃进村等处散步谈家事。

### 6.25

晴，给储德（注：作者长子）、仁德共写一信，套写各寄一份。

晴，上午 8 时半从李二哥家动身步行来大渡口十弟处。12 点到达。沿途看大字报。在大坪听一目睹昨天重钢起火死伤人的情况。

### 6.26

雨，上午大雨下午转晴。十弟今日礼拜。晚饭后同去杨家坪，松紧布（注：当时用于手工制作布鞋的材料）、糖精都无。买战报二张明天寄回。

### 6.27

晴，发储德、仁德各一信并寄回传单。渝德（注：作者侄儿，陈懋新子）今日由蓉返家。十弟今日去刘家坝（注：属九龙坡区，重钢五厂在该处）。上午我去杨家坪，十分无聊。琳儿仍无信到，心颇不安。

### 6.28

晴，得玖、仁德、仪德 25 日来信。下午给琳儿一信。计去沪已 6 日尚无来信，甚念。

### 6.29

晴，在家等邮差。果然上午得琳儿 26 日写来一信，谓已于离渝的次日平安到达泸县。当即作复，并给仁德一信，寄去传单。今日天热。

### 6.30

阴，十弟夫妇太苦。高玲珑（注：作者弟媳，陈懋新妻）晚上还在洗衣服。十弟又挑夜水。高三姐（注：高玲珑姐）近 12 点才回来。今天早上 7 点就要去上班。我十分怜惜他们。今晨近 6 时我起来发火，让他们多睡一点觉。本是热冷饭，但娃儿们一早又要吃蛋，又要吃牛奶，又要吃糯米稀饭。高三姐和她的儿子睡到 8 点后才起床。高玲珑说把糯米稀饭煮好后给高三姐和娃儿们吃。我说对这些我弄不来，在家也未弄过。结果十弟自己去煮。

### 7.1

阴，昨夜八弟（注：作者堂弟陈懋功，时居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教师）从北碚来，刁攀琼（注：陈懋功妻，朝阳小学教师）和两个孩子同来，在十弟家夜饭后回九龙坡。今晨 9 点我去杨家坪与八弟同来十弟处，晚上喝酒谈心至深夜，真是喜出望外。

高玲珑偕二子随其三姐去北碚她么姨家。今晨重医发生大武斗（注：两派本日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 2 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 66 级毕业生、砸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死伤多人。

### 7.2

早饭后十弟同去大坪等地游览，并去重医看昨日武斗现场。返来在杨家坪又见武斗队伍出动，公路上一辆汽车被砸坏。晚上喝酒。

### 7.3

晴，上午极热。八、十弟同去跃进村散步。中午三人共酌谈心，大醉。今午给七弟（注：作者堂弟陈懋咸，时居湖北武汉，武钢工程师）一信，告我弟兄三人在渝聚晤，独七弟不在深引为憾。闲谈中涉及家务最多。下午高三姐从北碚转来。高玲珑在途中走掉。不知今晚究竟在北碚或公路途中。十弟深怕两孩被武斗

所伤。夜饭后我们都去杨家坪看看。返时已近 12 点。气候过热，把凉板置于山头上。弟兄三人品茗谈心。

渝钢村已停水 2 天。中午十弟挥汗去马王场担水，桶大约有 120 斤。担得满头大汗，两担水担了三个小时。

#### 7.4

早饭后去杨家坪看高玲珑，迄至下午 7 时。在车站候车偶遇八弟和从未晤面的刁攀琼。他们转九龙坡。适高玲珑偕二孩回来，由王贤的女儿送回。北碚无车，前行至井口才赶上公共车。

秀侄（注：作者侄女陈秀，时居云南）6 月 27 日来信对陈玉（注：作者侄女，陈秀胞妹，1965 年下乡知青，1967 年 4 月 3 日惨死于山区）的死表示十分悲痛。

给八妹（注：作者堂妹陈懋芳，时居成都，无缝钢管厂干部）信托高三姐带去。晚十时又喝酒。

#### 7.5

写好家信一封分投三处：阿坝储德，泸县陈琳，忠县仁德。并附寄传单及扒手外传（注：《扒手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写的批判王光美的小册子。王光美时被称为“清华园头号政治大扒手”）。

高三姐今晨返成都，其子建平仍留渝。晚上与十弟去山坡上乘凉，十弟说我近来好像没有志气。杨家坪今天武斗。

#### 7.6

上午八弟偕其妻、子共四人来。适十弟、高玲珑均不在。下午四点十弟才回来。晚饭前弟兄三人共喝酒三两。八弟的两个小孩身体都不很好。来时买了一包水果糖和米花糖。几个娃儿大吃特吃。

整天与八弟、刁攀琼摆家常。

晚饭酒醉后偕八、十弟、小春（注：陈懋功子）去杨家坪。返来经西区公园

附近，突然在树林下站数人，手持三角长刀凶煞恶煞的大呼什么人往哪里去！说着就把刀对准我们。顿时弄得我惊魂失魄。放行后约二百步，突又有二人手持长刀头戴红藤帽，忽从黑暗地带站出来拦住我们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十弟答不是哪一派。又问参加的哪一派？十弟答没有参加。问到哪去，十弟答回家，我们是重钢的。我接连说我是忠县来的。

这一下把我魂都骇掉了，看来很有被戳一刀的危险。

我们都站住不敢动。另一持刀者又凶狠狠的说了个“去”，我们才急忙走到对面一边。这真开了大恩。也许是我们把路走错了，进入了他们的防线。听说他们是共校（注：共产主义劳动学校，今杨家坪中学）的学生。昨天钢校来打共校伤亡十余人还死一人，今天共校就严阵以待。

走到路上探照灯又把我们4人照住。十弟连喊我们分开走不要目标太大，以免他们误会。骇人，我巴不得两步就走向回渝钢村，一直是到了家心才平静下来，但回忆当时情景不免心砰砰作跳。骇死人。

八弟等今晚宿十弟家，两间屋共睡十人。

## 7.7

早饭后刁攀琼等离去，她一再要我去北碚，我送他们到车站，小秋（注：陈懋功女）一再喊“五伯来耍”。

中午有武斗人员近50人手持长刀，过渝钢村去跃进村抓人。不半小时就抓到两个俘虏。双手高举，头紧下垂，长刀四面逼住，仍从原来方向走去。

听说离此不到半里路的跃进村又搞大武斗。杨家坪也发生武斗。并听说离此不远的路上，有一过路的人约十七八岁，放哨的战士（注：指造反派武斗人员）手持尖刀盘问了行人。被盘问者放行以后喃喃自语道“简直像土匪一样”，于是战士们纷纷上前用刀乱戳，顿时毙命。

## 7.8

给秀侄一信告近状。给泸县李得琼（注：作者妻妹，亦即后文“么妹”，时居泸州，通用机械厂干部）一信告近来交通受阻，陈琳暂不返渝。

上午步行进城过警备司令部，凭退休证进去听“有关重庆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9点多到城。二哥病发卧床呻吟。6月29日八哥有信说陈琳能去乐至真是十年难逢，已去信泸县欢迎。

昨日嘉陵江大桥二轻兵团（注：二轻工业局系统的反到底派组织）与六中32111（注：八一五派六中32111战斗团）发生武斗开枪打人。据大字报死三人伤多人。其中一13岁小孩被刀戳死流血很多。今天我去那里简直是人山人海。警司四车战士手持武器守住二轻（注：指重庆市二轻工业局办公楼，时为二轻兵团占据）。二轻战士仍然端刀持矛，从屋顶到大门紧密放哨，并与警司广播唱对台戏。午后忽从大桥两头相对开来全副武装的卡车多辆，警司深怕又引起武斗，立即前去制止。殊不知此时二轻兵团全部人员即趁机执将武器、刀枪等冲出大门向大桥对面扬长而去。5时许，32111和警司人员进驻二轻总部。经搜出地雷（注：实为二轻兵团准备于国庆节使用的礼花弹）13枚。群众惶恐不安乱窜奔逃。我亦逃至对门高处。

地雷经群众过眼后即由警司战士捧到车上开回警司。

忽而又一辆满载手持刀矛的卡车从江北方向疾驶而来。众又大骇深怕又来此武斗。结果直驶入市。警司战士丝毫未理。晚上在上清寺听广播，并公布死伤人员名单。近11时又有“武斗”数人进入原上清寺餐厅查捕对手，弄得满街听众乱跑。就寝已近12点钟。

## 7.9

昨夜到今晨李二哥病情稍稳定。我出街买6封炒米糖给他泡开水吃。10点后慢慢的从城里走向大渡口。天气大（注：即天气热），很热，直到下午四时才到渝钢村。这两天这一方也发生武斗，也有死伤。十弟谈及也很害怕。

## 7.10

黎明十弟起身站轮子（注：即排队）买肉，我起身也去。轮子排得较长，买了2斤肉（带骨0.76）。十弟为弄肉忙了半天。高玲珑撮炭圆也忙了半天。



中午喝酒少许，头却晕痛欲病。下午对面山上又一阵哄闹说要武斗。杨家坪空压厂下午起武斗到晚上还未止。据说双方已各死二人。

街上大幅标语说中央首长谢富治、王力等来渝。果然则问题容易解决了，武斗也会停止了。

晚与十弟在山上乘凉谈家事。

## 7.11

早饭后去钢花村，远远看见有手持长矛的工人数十人分站三团准备战斗。我不敢近观随即折返，在重钢办公大楼前看大字报。十弟旋即来告我，看大字报暂不去钢花看，怕出问题，昨夜有一彪形大汉死于渝钢村不远的山沟里，死因不明。据目睹者谈，身穿白汗衫蓝裤，另一烂上装在死尸侧，全身无伤双膝有泥，双手反压地上，可能是绳子捆起的。另还有荷叶几张掩住尸体。等等。真是骇人听闻。又一老妇说她昨夜 11 点下班，亲见有人在渝钢村捕去一人，也是大汉，白上衣年纪约 30 以上。看来与死者相似。十弟下班回来越说越骇人。他和我商量再严重一点我可进城到李二哥家住几天，否则怕别人误会。真是“谈虎色变，人人自危”。

下午给母亲兑款，附言中写上几句：陈琳去泸来过一信。得鐔已有信叫琳去乐至。我已给幺妹去信叫暂时不走，在泸多住几天再说。路上交通有些受阻。不然走至中途成问题怎么办。并告懋功来渝亦因北碚交通中断没有回去。我可能在月底去北碚。

谈到昨晚上被人暗害身死的情形，回想到我们那天晚上在杨家坪被人查问的紧张场面，不禁大捏一把冷汗。

## 7.12

接得玖 9 日和仁德 10 日来信，告忠县文化革命运动情况甚详，红卫兵部队很占优势。同时也谈一些家事。一句话叫我放心。看完信高兴极了。传单拟把贺龙的一本（注：指群众组织所印批判贺龙的材料）寄回去。

给西藏昌都人民医院李其泓一信告二哥病。并请他带钱。

昨天死的人已查出姓名是 18 冶（注：即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的。

### 7.13

高玲珑早上入厨煮饭，见母鸡一只一命呜呼。十弟大吵不该买鸡。高临走时又布置怎么吃怎么吃。十弟批评她是资产阶级旧意识未掉。并说她如在农村不出来还不是饿死在农村。乃母乃姐都是在农村饿死的。

### 7.14

写成一信拟分投阿坝、泸州、忠县。今天广播警司转中央制止武斗六条。如能实行则幸矣。

### 7.15

三信均于今日投邮。

上午十弟某办公处亦来人持器抓人。下午十弟未去上班。办公处贴出大字报说不上班原因。中央（注：实指当时正在重庆视察的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决定今天交凶器，不少战团确已送往警司。但是否全部交完却是一问题。但晚上各处广播已未作互相攻击的话语，站岗放哨者表面上亦不见了。看来是在缓和。

### 7.16

去马王场新山村买洋芋，顺看大字报。在红楼当门看到《王力谈话》，两派主要人员均参加，从讲话中看武斗可以制止。

秀侄自云南来信，并附储德从阿坝去信，征求究竟是否留在阿坝的意见。秀侄转问十弟。这信写得较好没有错字。

琳儿去泸仅到时来过一信。迄今一直无消息令人悬念。

晚与十弟在山坡上乘凉谈家常事。

### 7.17

今天是重钢礼拜（注：这天本是星期一，重钢因用电安排等问题当时常不休息星期日），十弟又忙得不得了。早饭后我去九龙坡光明村二村 88—13 号，找（李

光明)家的李八妹适外出。据李妻告我电厂武斗尚未制止。我在进村处看贴有7.17的杀人凶手必须严惩。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等惊人标语。看来武斗的确尚未制止。在车上又听人说警司挂牌被人砸烂。去时走火车路。返时乘车至杨家坪,步行返渝钢村。一路行人不多仍有惧意。

### 7.18

得八弟自北碚来信,谓七弟已从汉口返忠(12日),昨日已到北碚,叫我和十弟去玩。但十弟确因路费无法解决不去。

武斗现象渐减少,据十弟说泸州有人来谈,那里武斗现象也严重。我深为琳儿焦急,为什么一直未来信。

晚上与十弟出外乘凉。深夜十弟去挑水。

### 7.19

复八弟信,告决定不去北碚,希七弟过渝来玩。信投后又接七弟来信:谓同陈杨、明二孩于12日离汉,15日抵万,16日到渝,17日到北碚,约住4、5日回忠。盼见信后回复。又八弟在信尾批有去北碚乘车情形。

来渝今天已满一月。

### 7.20

接得玖17日来信。大意是:1.担心重庆武斗。2.七弟从汉口去电谓12日离汉返家。昨今两日全家老小均去江边接。后又接电知己来渝。3.琳、森(注:作者长子陈储德乳名森森)两儿久无信。传说阿坝发生地震,垮了一匹山。又说有4位工人来成都,其中有森儿。又说已调一部分去青海、甘肃等地。琳儿是到泸后来过信。4.忠县保派反戈者很多。徐大州等200余人上京告状碰壁而回。5.六妹在家不听话,经常发脾气,以不吃饭不回家来威慑。6.天气已热,修德、仁德在长地坝架一洗澡处。7.粮票下月带来。8.秀侄寄回的10元因扯不拢已用了。9.新民(注:作者外甥陶新民,居忠县乡下)来买猪儿我们给二元四嫂给一元。

下午钢校又几乎发生武斗。有一派开来几车人要夺尸,双方广播大声疾呼直

到深夜未停。

中午曾去办公大楼看大字报。天未下雨却很凉快。傍晚山坡上几无一乘凉者。我和十弟带着渝德等散步。8点半入睡。

### 7.21

上午带渝德、陈琼（注：陈懋新女）去钢花村（新山村）玩。七弟仍未见来，莫不是直返忠县了。

听说杨家坪今天又发生武斗，死数人，省革筹组长张国华司令员（注：“司令员”之说有误，张国华时为成都军区政委）等赶到现场，双方却均匿无踪影。又据说中央首长谢富治、王力在武汉被暴徒杀伤，王伤势较重。渝钢村附近两个派的广播又大肆叫吼，又呈恐怖状态。晚饭后有两个汽油弹，不知是谁投于渝钢村，距我住处仅隔两栋房屋。当时群众一哄而至，我亦去现场看了一下，只见一堆白灰和一张红布。投掷人逃跑无踪。10点左右一派广播说：渝钢村家属请注意，今晚某方准备大批人马要来进行武斗，务必密切注意。弄得大家惶惶不安。

### 7.22

昨夜通宵未安眠，几次起身看动静。广播直至12点后。当更深人静时，又闻远处犬吠声。深怕武斗人员来临。

晚饭后与十弟去钢花村散步，满街贴了谢副总理、王力在武汉被杀被斗情况。返来天已黑，经马王场回家，感到毛骨悚然。

七弟今天未到。如过渝不来一晤，真是遗憾万分遗憾万分。

琳儿久无信，令人悬念。在路上有人谈泸州武斗情况，我不便追问。十弟主张去信问究竟。

### 7.23

今晨中央广播谢富治、王力已于昨日下午返回北京。中央领导人和群众数万人往机场欢迎。为此则武汉事件已属实。武汉“百万雄师”已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琳儿去泸县今天恰满一月，仅来一信令人焦急。

## 7.24

给得玖一信问琳儿有无来信。据十弟谈泸县武斗相当严重。随信附寄传单一束。计算时间七弟定已返忠，与十弟商量拟去挂北碚电话询问。晚饭前七弟忽带两孩到，真是喜出望外。高玲珑临时又备办一桌菜肴。七弟善饮，弟兄三人共酌谈心。醉后去山坡上乘凉。晚已到下一点还不欲睡。与七弟一别 17 年，今日相逢就苍老多矣。我一见面联想到已死的弟兄、叔、父，不禁怆然泪下。

(下期连载之二)

---

### 【闲读偶记】

####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

#### ——《记忆》第二期读后

鲁 丁

我读《记忆》第二期唐少杰和徐海亮的文章产生了一个感想，这就是：“文革研究要关注未开垦的处女地——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我觉得这是《记忆》第二期给人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唐少杰先生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简介》一文中，即在介绍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这本书时，讲到它的一个特点：“此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以鲜活的话语和真实的记述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读到这里我很感慨，沈迈克先生曾送给了我英文版的这本书，但由于我不会外文，我只能作为纪念品放在书架上，不能读，因而也不能做出任何评述。学外文，会外文重要啊！

徐海亮先生在《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一文中评价说：“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全方位地介绍了典型村庄的社会历史、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等，忠实地记录下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从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时代性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看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

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会发生今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书里通过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看这本书，是把它看成学术著作作品？还是将其视为烦琐无味的乡土纪实？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在美国人韩丁的这本书前汗颜，我们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深掘具体的文革学与泛义的社会学题材，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去高谈阔论一些抽象概念。和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样，韩丁的书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农民群众。”读到这段话，我也深感“汗颜”。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我就没注意到农村文革这个问题，或者说，农村文革问题根本就没进入我的视野。

这是我个人的局限和仅仅是我个人的缺点吗？不，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徐海亮先生所接着指出的：“过去一个阶段的文化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运动，造就了历史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浸浴着特定传统文化的亿万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了——乃至批评了中央的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这段论述是一非常深刻、非常精辟的，对文革研究来说，乃是振聋发聩之论。徐海亮先生说得好！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革（姑且不论其观点、结论和成就如何），都十分注意把目光投入平民中，而我们中国人研究文革为什么却忽视了这点呢？或者说没完全注意到这点呢？这是值得我们严肃考虑和深切反思的问题。

应该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平民百姓中的情况和问题还是有所反映的，这是和过去有不同的地方。我孤陋寡闻，举不出很多的例子。但我看到的已出版的余习广编辑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和

徐晓编辑的《文革书信集》，应该说，这些都就是反映平民百姓的情况的。还有很多文章谈到了一般群众和青年学生对文革的意见和看法，因而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遭遇。不过总的说来，在文革研究中（不仅在文革研究中），我们对平民百姓的情况是注意和重视不够的，从而导致我们的整体文革研究有严重的片面性，或者说是畸形的。这确实确实如徐海亮先生所说，在韩丁（以及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面前，我们应感到“汗颜”。

为什么？从深层次看，我认为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和我们的党文化传统有关。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历代修的历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一点也影响到我们修党史。翻开我们的党史书看看，仿佛几乎成了领导人物的传记，甚至是最高领导一个人的传记。拿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创作和演出的（也拍成了电影）、周恩来被称作“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来说吧，从始至终基本上就是歌颂毛泽东一个人。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1975 年 4 月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对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有一段评述，他说：“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按：1964-1965 年来中国——笔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相片到处都是，把别人的都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 30 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 1936 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很感不安地想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转引自《随笔》2008 年第 4 期《〈东方红〉随想》）这《东方红》虽然不是历史著作，但它是以艺术的手段表现历史的，它形象、鲜明而生动地反映着我们的党史观，我们的党文化观。斯诺这段评述非常客观、深刻，简直入木三分。斯诺不仅如此，他还因为自己他 1936 年为毛泽东所摄的照片成为宣扬和鼓吹“狂热崇拜”的道具“很感不安”。总之似乎可以这样说，“眼皮向上”，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党文化传统的共有现象，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熏染和陶冶着中国人，日久天长，使之简

直成了转化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到现在为止，这种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党文化传统，我们究竟放弃还是没放弃？或者说，放弃了多少？不错，我们宣誓信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和群众始终不离口，但是真正的人民大众及其活动进入了和能够进入我们的历史著作吗？说实话，人民群众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几乎都呆在被遗忘的角落。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标签四处可见，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得到了多少体现？在一些人眼里，老百姓几乎成了“老败兴”。在眼里和心里只有上级，只有领导（领袖），这不是直到今天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吗？

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最高领导明明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所谓“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其中心内容就是把文革从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推广到工厂和农村中去；认为不这样，文革就会半途而废。有什么“理论”，就有什么行动。文革也确实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无时无处没有阶级斗争，无时无处不进行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徐海亮先生说的“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研究文革仅限于上层人物和风云人物，能够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全貌吗？不能，显然不能！

现在我们的文革研究还处在极大的禁锢之中。三十周年、四十周年连个纪念都不允许，遑论研究文革中的群众。倒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外国人个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不要效仿和学习？

韩丁的《深翻》已有中文版（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5 月出版），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什么时候能出中文版？这两本书的出版能不能帮助我们冲破一些禁忌，从而使我们对文革中的群众的研究开辟一个新局面。我们盼着，热切地盼着！

2008 年 9 月 18 日

于北京昌平园中园

---

【故纸堆】

## 边教学 边改革

###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通过实践改革了三个体育项目



## 《人民日报》讯

本报讯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工人，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边教学，边改革，在教育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以“斗私，批修”为纲，推动教育革命。在开始复课闹革命时，有些教师思想有顾虑：“教新的没有，教旧的又怕学生造反，怎么办？”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动批判了“等改好了再上课”的错误思想，树立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的决心和信心。大多数教师都丢掉了怕字，换上了敢字，表示敢教学，敢大胆改革。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任务。怎样改？从何着手？是他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江青同志抓京剧改革的伟大创举，为教育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院革命委员会研究了各个项目的情况，认为武术的封建糟粕最多，体操的修正主义气味最浓，就决定先从武术、体操开始改革。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们派出由少数革命师生组成的专门队伍，有计划有目的地到工厂、农村、部队，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一起进行改革。同时，体操专业的革命师生根据工农兵的要求，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工农兵一起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操》，在广播操阵地上插上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受到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目前，广播操、武术、体操的改革已告一段落，并初步总结了一些经验、体会在全院推广。这三个项目的改革，对全院教育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教育革命的迅猛发展，改革了过去那一套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服务的组织机构。革命的教师、干部都冲破了办公室、教研室的束缚，按系、按年级编入学生班。院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深入班级，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搞斗批改。广大革命师生一致认为：复课闹革命，必须一边教学，一边改革。过去武术课是上初级拳，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不易掌握；现在改上语录拳，既是武术课，又是毛泽东思想课，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掌握动作又快。过去教学内容由教员包办，现在由学生自己安排，改变了学生围着教师转的情况，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原载 1967 年 11 月 28 日《人民日

---

【小资料】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1968 年 2 月 21 日成立 )**

主任——

黄永胜，58岁，湖北咸宁人，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农出身

副主任——

孔石泉，59岁，湖南浏阳人，湖南浏阳人，广州军区政委，中农出身

陈郁，67岁，广东宝安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贫农出身

王首道，63岁，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贫农出身

邱国光，50岁，福建上杭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阎仲川，46岁，河北定兴人，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军管会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黄荣海，53岁，江西万安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贫农出身

刘继发，33岁，广东三水人，广州重型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预备党员，广州“红旗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及工革联负责人，工代会负责人，“红旗”派

黄育英，女，24岁，揭阳县桂岭公社民办小学教师，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常委——

陈德，54岁，广东潮安人，广东省军区政委，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贫农出身

袁德良，52岁，山西汾阳人，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贫农出身

孙正乾，49岁，山东馆陶人，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富农出身

白平，49岁，陕西兴平人，广东省军区副政委，自由职业者出身

林李明，58岁，广东文昌人，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代理省长，中农出身

罗天，48岁，广东普宁人，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赵卓云，54岁，河北无极人，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寇庆延，56岁，河南光山人，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党向民，46岁，陕西郃阳人，原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贫农出身

舒光才，49岁，江西兴国人，原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贫农出身

范希贤，50岁，福建永定人，原广东省商业厅厅长，雇农出身

王世琳，56岁，江苏桐山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财贸政治部主任，中农出身

梁锦棠，28岁，广东江门人，广州电机总厂工人，“红总”（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代表，工人出身，中共预备党员，“东风”派

刘均益，25岁，广东梅县人，广州轧延厂工人，“工交红旗”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程定章，29岁，广东三水人，韶关石人嶂钨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邱学科，30岁，广东清远人，广东省建筑一公司五工区工人，“工联”（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派广州工人联合总部）负责人，贫农出身，预备党员，“红旗”派

莫超海，27岁，广州人，广东省电影机械厂工人，“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代表，工人出身，共青团员，“东风”派

田华贵，34岁，广东博罗人，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党支部书记，省农代会负责人，贫农出身

钟荣欢，30岁，广东恩平人，恩平县白银大队民兵营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梁秀珍，女，24岁，广州人，广州沙河公社东方红大队社员，“郊贫联”负责人，中农出身，共青团员，“东风”派

高翔，25岁，福建福州人，华南工学院学生，华南工学院红旗公社及广东“红三司”负责人，干部出身，中共预备党员，“红旗”派

武传斌，24岁，河南济源人，中山大学学生，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团及广东“红旗派”负责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林昌文，26岁，广西北流人，中山医学院学生，中山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及广东“新一司”负责人，华侨工人出身，中共预备党员，“红旗”派

易作才，29岁，湖南湘阴人，广东工学院学生，广东“红一司”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倾向“东风”派

注：广东省及广州地区群众组织两大派是，以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华南工学院红

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等为主的“红旗”派，又简称“旗派”；以“地总”、“红总”、“红一司”等为主的“总派”，“总派”因认为 1967 年 3 月军区镇压“旗派”的“镇反”不是“三月黑风”而是“三月东风”，又称“东风”派。后来工交红旗（刘均益）和红一司（易作才）被称作游离于两派之外的“第三势力”。

---

#### 【编读往来】

一、本刊第二期发出后，收到了众多友人来信。其中瑞典文革史专家沈迈克教授的来信最为有趣。特载如下，与读者诸君共赏——

《记忆》诸位编辑：

贵刊第一、二期已收到，谢谢！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我这“老外”早就说过，最有水平的文革史研究中的最有水平的文革史研究，毕竟还是由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学者进行的。海外有人背着手撒尿——不扶（服），但我还是坚持这么说，而你们现在出《记忆》是证据之一！我已经把两期转发给加拿大、德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反映都是非常好的，并期望你们将会继续以这个方便的形式发行。因自己教学任务这两个月较重，还没来得及考虑投稿的事，等入冬再说。

布礼！

瑞典刊友

沈迈克

2008-9-19

二、今年是杜光先生八十寿辰，杜光老将其《八十感言》中的一段文字摘赠本刊，愿与编读者共勉。兹录于次——

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患难？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可以说是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正是这些坎坷、磨难，积累成我们的精神财富。……坎坷和磨难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痛苦的记忆，也蕴涵着丰富的教训，它需要我们去回顾，去梳理，去思索，从中发现人生哲理和社会发展的真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够积累成为我们现实的精神财富。这个开发、冶炼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它使我们再次经历那些难堪而无奈的往事；但也可以构成为无穷的乐趣，因为通过反思往事而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了解过去之非而取得新的认识，这是最值得高兴的。

三、赵诚先生致函本刊云：“（王年一）2005年11月12日致舒云信中说，毛容忍江找面首，一定有过硬史料，不然王老不会这样说，但与近年来所传不一致。”本刊设有“江青研究”一栏，希望方家就此赐稿。

四、胡小水先生致信本刊，询问王年一的《军队一·一三事件目睹记》，阎长贵关于“揪出军内一小撮”，及王年一信中提到由郝建整理的“文革研讨会记录”等文章和著作哪里可以看到。兹复如下：王年一写的《军队一·一三事件目睹记》一文，我刊本拟在第一期上发表，但未找到此文。如有知道此文下落者，盼告本刊。阎先生关于“揪出军内一小撮”之文，本刊将代为联系。关于由郝建整理的“文革研讨会记录”已于2006年由美国溪流出版社正式出版。胡君可与郝建先生联系。郝的电子信箱是：[haojian8963@yahoo.com.cn](mailto:haojian8963@yahoo.com.cn) 如需电子版，请告本刊。